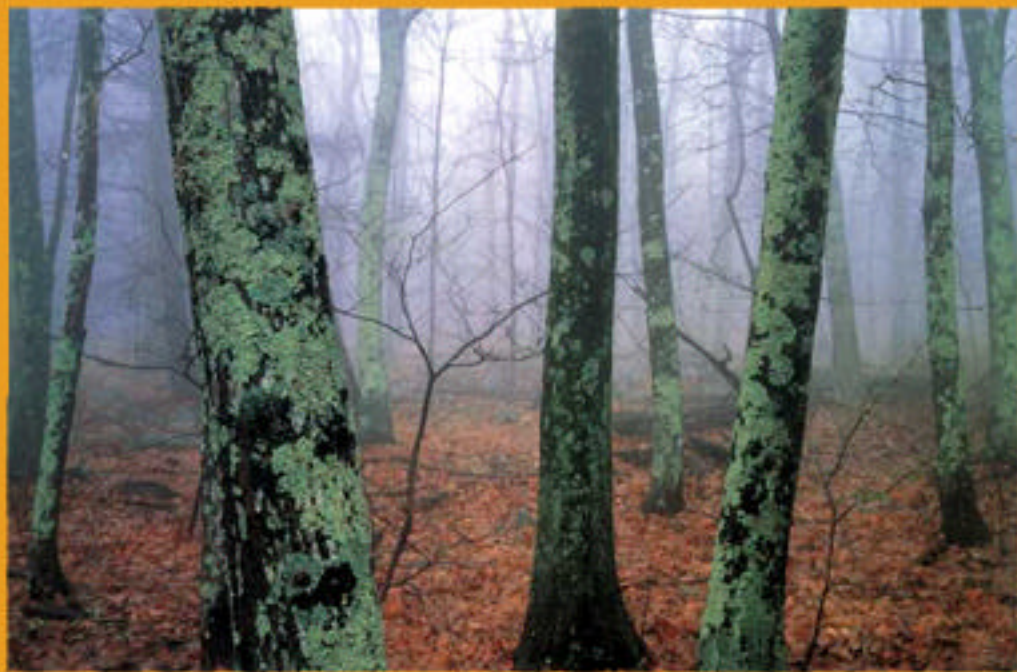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鲁迅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鲁迅传

XXX 编著

目 录

一、伟人的诞生.....	002
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05
三、初尝人世辛酸.....	022
四、东渡扶桑.....	031
五、黑暗中的苦心摸索.....	055
六、打破沉默，领导新文化.....	064
七、光辉的十年.....	120

一、伟人的诞生

1881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初三），绍兴城内一位伟人出世，这位伟人就是鲁迅。

在距今一百多年前鲁迅诞生的当时，绍兴城是封建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府城。封建君权虽然已经发生动摇，但是它还未被推翻，仍在苟延残喘，暂时维持着统治的局面。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大多由石板铺成，而每条街上差不多都有一些台门，只是规模不一而已。在那些较大的台门里，门斗上往往挂着一块或几块“进士第”、“观察第”、“大夫第”之类的匾额，这便是那些大家族居住的府第的标志。鲁迅就诞生在绍兴南城的都昌坊口东面不远的的一个台门里。那是一座很阔气的房子，住在里面的是包括鲁迅一家及不少近房本家的大家族——新台门周家。进了大门，穿过一个铺着石板的天井，就到了大厅，穿过大厅向后走去，走过几个天井，就看到一排五间楼房，在那从西往东数的第二间的楼下，就是鲁迅的诞生地。

新台门有副对联：“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在鲁迅故家的正屋中央还供着一块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这些就是周家祖祖

辈辈奉行的为人处世的准则。

鲁迅出生时，家境虽由富而贫，但尚有四五十亩水田，生活不成问题。祖父周福清（介孚公）是翰林，由翰林院授编修，后改放外官。他的性情非常耿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能毫不容情地指责或批评别人的是非曲直，这自然容易遭受别人的猜忌。他在江西金溪做过知县，不计较职位大小，是一个严正的清官。祖母性和善，非常喜爱鲁迅，常给他讲故事，教他猜谜语。父亲周伯宜，是读书人，平素寡言笑，看上去似乎很严厉，实际并不厉害。他没有做过官，也不善营生，用旧式方法管教孩子，欲把儿子训练成刚强、正直、坚定有骨气的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受到欺负，应该予以强有力的还击，但是决不能无端地仗势欺人。母亲姓鲁，名瑞，从绍兴乡下嫁到周家，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能干，也能吃苦，还“自学成才”，能够看懂一些书。鲁迅这些直系亲人的性格对儿时的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周家是长男，按当地的迷信说法，长男不易养大，所以在他不满一岁，父亲就把他抱到离家不远的长庆寺，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并取了一个法名为“长庚”。而鲁迅本来的姓名并不叫做“鲁迅”，这是他后来所常用的一个笔名，随母亲的鲁姓。他的最初的名字叫做樟寿，字豫山，因为“豫山”二字，如

按绍兴人的读音，和“雨伞”很是相似，不太好听，故不久就把豫山改为豫才了。18岁那年，樟寿这个名字被改为树人，所以，通常的提法是：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幼时聪慧异常，记忆力很强，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是私塾教育。大约在7岁的时候，鲁迅开始进私塾读书。学堂就在新台门里，第一位老师是玉田老人。在新台门里，玉田老人藏书颇丰，属第一，包括绘图《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书上印着许多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成为幼年鲁迅眼里的奇书。此外，玉田老人还珍藏着写满晦涩难懂的语句的“鉴略”，鲁迅对它们丝毫不感兴趣。经过一个很短促的时期，玉田老人不教了，换了一位本家叔祖，名子京老人。这位老人不但学问不高明，而且性情有些乖僻。他的文章做得古怪，因而连半个秀才都没有捞到，只好呆在家做私塾教师。他的景况是颇为凄凉的，由于性情乖僻，他的两个儿子也很少与他来往，他就一个人住在新台门里一间楼底下的房间里。这间楼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因房门紧闭而显得阴森和悒郁，一到黄昏时分，总有蝙蝠从门窗的破洞中飞进飞出，更添加了不少寒气。鲁迅和他的同学们是很不喜欢这个地方的，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就是鲁迅在日后回忆文中描写到的“

百草园”。百草园是这样的一个园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比桑椹都好得远”。

百草园的冬天较之其他季节显得乏味，可是，当洁白的雪花在园中飘洒时，百草园迎来了一位从乡下来的小朋友——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的闰土。闰土的父亲叫章福庆，在鲁迅家做短工，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并有一手很好的竹作手艺，家里有六七口人，生活过得十分困苦。鲁迅的家是他的老东家，除了竹作之外，还给周家帮年时（过旧历年时的临时帮工），人们都叫他阿福。阿福与周家的关系不错，只要忙完庄稼活，他就把田里的事委托给邻居们照管，自己便跑到周家来做活，忙不过来时，他就提出要他的儿子来帮忙，周家是不会拒绝的，闰土就这样来到了周家，步入了鲁迅童年生活的“百草园”。闰土本来并不叫

“闰土”，在家叫闰水，因五行缺土，故而叫“闰土”。他大鲁迅两岁多，一到周家就和鲁迅熟识了。鲁迅常常陪他逛街，带他看看乡下没有见过的东西，而闰土也时常给鲁迅讲一些城里所没有的，在海边乡村里发生的新鲜而有趣的事情。给鲁迅印象最深的，就是怎样在夏天夜晚的金黄色的圆月下，手捏钢叉向啦啦响着的吃瓜的猹刺去。闰土的父亲还教会他在雪地上如何支起一个大竹簸，捕捉鸟雀的方法。在小鲁迅眼里，闰土也好，闰土的父亲阿福也好，知识是非常广博的。从他们嘴里所吐露出来的那些新鲜而有趣的故事，以及他们从乡下带给鲁迅的赤豆、青豆、西瓜、贝壳、鸟毛……，在幼年鲁迅的心灵里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闰土成了鲁迅的好朋友，成了“百草园”里的一道风景。可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同，鲁迅和闰土之间毕竟有一些距离。这种距离在客观上日渐加大，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两种人走的是相反的路。难怪到后来鲁迅长期离开了家乡，他们中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二十年后的闰土称鲁迅为“老爷”，甚至叫自己的儿子给“老爷”磕头。这是鲁迅幼年时所未曾体会和预料到的可悲。

在“百草园”中，除去闰土这位小伙伴外，鲁迅还有两位亲近的朋友。一位是领着幼年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另一位是鲁迅的祖母。

长妈妈是一个淳朴勤劳的农村妇女，她的生平经历，现在已经很难查考了。据说她在乡下死了丈夫，也丢了土地，没法过活便跑到城里来谋生，来到了周家。没有人知晓她的姓名，因鲁迅的祖母叫她“阿长”，其他人也就跟着叫她“阿长”，鲁迅和别的小孩都亲切地叫她“长妈妈”。长妈妈从农村来，因而她懂得许多莫名其妙的道理，还有许多规矩，这一切都是鲁迅所不理解的。譬如说，人死了，不说死掉，而说“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里，是不应该走进去的；饭粒子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等等。平时她不许孩子乱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是顽皮，要去告诉母亲去。夏天睡觉时，她伸开四肢，在床中央摆成一个“大”字，挤得鲁迅没有翻身余地，推她呢，不动；叫她呢，她听不见。因而最初，鲁迅并不怎么喜欢她。有一次，长妈妈不小心踩死了鲁迅的心爱之物隐鼠，使得鲁迅非常生气。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鲁迅对她产生了好感和敬意，那就是她会讲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还有一件事，更使鲁迅对她发生了很大的爱，长妈妈不知从哪里为鲁迅寻到了一部他朝思暮想已久的绘图《山海经》。

这绘图《山海经》一事是由前面曾提及的玉田老人惹发的。他的藏书很多，在课余总喜欢将他心爱的

书拿给鲁迅等孩子们看。那些书上面都印着许多好看的花草和树木，引发了鲁迅等人极大的兴趣。但是玉田老人说，他还有一部绘图《山海经》：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什么好看的玩艺儿都有。可是，翻遍了地方也没有将这本书找到，馋坏了鲁迅和他的小伙伴。他们虽急于想见识见识这样的奇书，但又不好意思去逼着这位老人去寻找，买也买不着，问谁谁都不知道，这成了鲁迅的一块“心病”，平素静下来，总念念不忘这本书，并且还告诉了长妈妈。过了十多天，长妈妈在她告假回家又返回周家的时候，一见面，就递给鲁迅一包书，并兴高采烈地说：“哥儿，有画的‘三哼经’，我给你找来了！”这是一个怎样出人意外的消息啊，它像一个晴天霹雳，使鲁迅全身都震动了。他赶紧打开包一看，是四本小小的书。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但凡玉田老人讲到的以及没讲到的，全包括在里面了。只是纸张太黄，图像很不正规，连动物的眼睛都被刻成了长方形。这部刻工印工都极糙的绘图《山海经》，是鲁迅从长妈妈的手里接过来的不平凡的心爱之物，这是幼年的鲁迅第一次读到的比一切别的书更为使他感动的书，这也使得鲁迅对长妈妈产生了无比深厚的情意。鲁迅认为，别人不屑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做得很成功，她似乎有一股伟大的神力。

除长妈妈外，在鲁迅家里，祖母也是他的一位好朋友。炎热的夏天，每当夜幕降临，鲁迅就躺在一株大桂花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坐在桌旁，一面摇着芭蕉扇，一面给他讲故事或是叫他猜谜语。慈祥的祖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故事呢？她会讲关于猫的故事，她说：猫虽比老虎小那么那么多，但是却是老虎的师父。猫教给老虎扑的方法，捉的方法。等这些本领都学会的时候，老虎想充老大了，就盘算着如何把强过自己的猫杀掉。主意打定后，老虎纵身一跃，向猫身猛扑过去。猫呢，它早料到老虎会这么做，便跳上了树，就逃过了老虎的黑手掌。原来，猫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教它上树，老虎不会上树，就只能怒睁双眼，无可奈何地蹲在树下。她还会讲“水漫金山”的故事：许仙的老婆白素贞，是一条白蛇修炼成人的，因许仙救过她和义妹青蛇，就化作女人嫁给了许仙，以报救命之恩。夫妇俩本过着恩爱无比的日子，半路上却杀出一个法海和尚。他看见许仙带些妖气，并认定他定是娶了一个妖怪，于是就把许仙藏在了金山寺，以躲避妖怪“作恶”。白素贞带着青蛇前往金山寺寻找许仙，法海不肯交人，白蛇娘娘便召来虾兵蟹将，“水漫金山”，触犯了天条。法海和尚施计骗住了白素贞，把她装到一个小小的钵盂里，这钵盂被埋在地下，上面还造了一座塔来镇压她，这塔

就是竖立在西湖边上的雷峰塔。鲁迅听了这个故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法海此人甚为多事，心里很是替白娘子抱不平。当时，他还希望那座镇压着一个美丽灵魂的雷峰塔尽快倒掉，而对于螃蟹里的“蟹和尚”永无出头之日这一传说，认为非常满意。后来，鲁迅把白娘子的故事写进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在自家的台门里读书告一段落后，他接着开始了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光。三味书屋不在他们的新台门里，离老台门很近。走过周家的老台门，向前走没多远，再折向南，过了一道跨在张马河上的石板桥，就到了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有着黑色油漆的竹门，还有书房。书房坐东朝西，通三间，砖铺地，中间挂着一块横匾，上写“三味书屋”四个大字，匾下是一幅画，画着一只梅花鹿伏在古树下面。画的前面摆着一张炕床，炕床的前沿摆着一把大圆椅和一张八仙桌，桌子的两旁是茶几和椅子。孔夫子的牌位是没有的，学生就对着匾和梅花鹿行礼。

在书房前面有一个小天井，宽约六七尺，长约两三丈，比较狭长。天井里有一条石凳，对着书房门，石凳上放着一盆书带草和一座小小的假山。天井的西南角还有一口很大的积水缸，是专门预备来下雨天盛雨水用的。书房的后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园里有两

株桂花树，东墙脚有一个砖砌的花坛，花坛北端有一株腊梅花，南端是一丛天竹。这是学生们活动的场所。在冬天跳上花坛可以攀折腊梅花，在夏天，爬上桂花树就能寻找到蝉蜕，不过要是给先生知道了，那是不行的。

三味书屋的先生是一位须发花白，戴着阔边眼镜，高高瘦瘦的老人，名叫寿镜吾。他博学、质朴，待人和气。炕桌是先生的，在两侧，排列了十多个学生的座位。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沿，桌子是长弓形的，还带着抽斗，桌子后面放着一张椅子，略微低些。书屋的规矩很紧，数全城最为严厉的了。比如：三味书屋定于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那天开学，过了清明就不再收学生。而别的书塾，清明后还是可以进去的。学费也是最贵的，每节两元，先生从不多收其他学杂费，两元就是两元。其他地方虽说收得低些，但那里的先生自有他的“生财之道”，那就是逢初一、十五这样的节气，收学生十几个铜钱，这就没有了三味书屋寿先生的方正清廉了。而且寿老先生教书极为认真，如有学生三天不去读书，他就找上门去。他还有一根竹子做的戒尺，气极了的时候是要打人的，不过并不常用。如果真要遇到不听话的学生，他生起气来就把学生回掉。这在三味书屋里称为“推出去。”

三味书屋里的功课，一开始是读《百家姓》，再

读《神童诗》，而后才是《四书》和《五经》。年纪较大的学生，正课读好了之后，还要读《唐诗三百首》。鲁迅来到这里以前，在自家的台门里已经读过了几年书，因此不必从头开始读，在这里，他从读《诗经》开始。每天早晨，他穿着一件洗得十分干净的竹布长衫，背着蓝布书包，衣襟的钮扣上吊着一把开书桌抽斗的钥匙，走进书房里来，侧着身子把书桌抽斗打开，然后就开始背书。背完书后，再“上”书；“上”到的地方，先生用银铢笔给号上一个日期。这之后是读书，约摸中午时分，还要写一张大字，字写好了就摆在先生的桌上，如果有什么差错，先生就会用红笔加以更正，写得好的呢，则圈上几个红圈儿。写好了字，就回家吃午饭。下午仍是读书，傍晚对课，对过课，一天的功课也就完结了。

读书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每个学生都放开喉咙大声朗读，弄得沸沸扬扬。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寿老先生自己也念书，有时候，学生们的声音低下去了，书屋显得很安静的时候，他仍在高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干杯未醉喏……”，读到这里，他还伴之以摇头晃脑，非常入神。他的专心致志，给在座的徒儿们提供了游戏的看闲书

的机会。有些孩子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鲁迅则拿出《西游记》等“闲书”，伏在桌上偷偷地看。为防别人搅乱，鲁迅在自己的桌上写下“君子自重”四个字，别的孩子也就不去打扰他，以做一回知道自重的君子。此外，鲁迅还会乘机描画儿，他用一种薄而透明的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把铜墨盒放在抽斗里，用笔蘸着墨汁，像习字时影写一样，一笔一笔地描。描的画儿随读的书变得越来越多，竟描了厚厚的一大本。有的同学很佩服也很欣赏鲁迅的画技，拿来纸请他画，甚至带回家，用金纸镶上边，挂在墙壁上天天观看。不过，无论是看“闲书”，还是描画儿，要是被先生发现了，便被斥为不务正业，鲁迅是受过先生的责骂的。

完全自由的时间当然是放学以后了。做完功课，鲁迅才吃饭。饭后，他揩干净四仙桌，而后搬出画谱，一张一张地翻看，看完之后就动手描。在翻阅的时候，鲁迅很是仔细，手指上是没有一点墨迹或其他脏物的，弟弟们可以同他一起看，但不允许伸手在画册上乱摸。如果有谁有摸一摸的念头，或是用手指头点一点，他是要加以阻止的，惟恐弄脏了那些洁白的书页。看完之后，他把书有秩序地摆进一个皮箱里，而书与书之间还要插些樟脑，以防蛀虫对书的侵蚀。

鲁迅比较热心的工作之一还有搜集画谱，许多画

谱都是他用压岁钱买来的。如《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和《点石斋丛画》、《诗画舫》……这些画谱的装订都较糙，所以买回家后，鲁迅都会用绢线认真地装订一遍，有时还会装上栗壳纸的封面。也有人送给他一些画谱，有一位长辈就赠给他一本《二十四孝图》，他开始非常高兴，等到听人讲解了全部故事之后，就有些反感了，特别是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图，感到非常不快。如对“老莱娱亲”一事，认为这位70岁的老莱头假装跌倒地上、逗人发笑，十分的矫揉造作，不近人情。可见鲁迅当时对图画已有初步的鉴别能力和批评眼光，而且重真实性了。他喜欢那些生动有趣的年画，一张是长嘴大耳的“八戒招亲”，一张是满纸新郎、新娘、傧相、客人都尖腮细腿，穿红着绿的“老鼠成亲”。他把这两张贴在床前，有时竟然乐不可支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在课外，鲁迅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抄书，他抄的是他所喜欢的与花木虫鸟相关的读物。从抄书引出来的另一件事情是种花，幼年的鲁迅几乎可以称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小小植物学家。他通过努力认真地看书，懂得了某些花草的栽培方法，而且还孜孜不倦地对花草进行了分类和定名。每每得到一种新花草，他就会参考《花镜》之类的书，进行一番查考，而后在花盆里插上一根竹签，写明这种植物的名称。他种的花有

鸡冠花、万年青、映山红、栀子花、蝴蝶花、月季花……每年还要进行收籽的工作，用纸包成方包，写上名称，好好地收放起来，以备日后再种。为此，他要参阅更多的书，他就更加忙于抄书，日积月累，小鲁迅看过和抄过的书也已为数不少了。

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那个年龄段，鲁迅还跟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小住。鲁迅的外婆家，是在绍兴乡下，叫安桥村。这个村庄离海不远，极为偏僻。有条小河从村中流淌而过，把全村分为南北两半。当时全村大约有三十户人家，大半姓鲁，靠种田和打鱼为生的占多数，有很少一部分人经营副业——做酒，并开一家很小的商店。鲁迅是在春天扫墓后，随母亲前去的。就是在这里，鲁迅见识了许多更新鲜的风景和玩法儿，看到听到了“社戏”。很幸运，鲁迅能有这样新奇广阔的天地。

因为鲁迅从城里来，算是远客和贵客，所以村里有很多小朋友得到父母允许，减少了日常劳作的份量，尽情地陪着迅哥儿玩耍。玩的方式很有趣，比如掘蚯蚓伏河边钓虾呀，或是一同去放牛呀，而最大的乐事却是看社戏了。有一回，他们去邻村赵庄看戏，鲁迅日后是这样回忆的：“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待到母亲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两人一枝，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背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正是对船头的一丛松林，……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就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外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鲁迅 13 岁的那一年因祖父下狱，他和弟弟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

鲁迅这次来到舅父家中，景况和从前完全不同了，自此免不了要受一些冷淡。但是，劳动者和他们的孩子们却到处都是——一样，他们依然是那么热烈，那么殷

勤，前来接待从远道来避难的小客人。

乡下的春天依然是美好的，罟泥船停满了河面，河两岸是青青的麦田，田埂上长着绿油油的罗汉豆。白天，大人们都到河里和田间工作去了，鲁迅就和孩子们一同玩耍，或是钓鱼，或是剥着罗汉豆。在皇甫庄和小皋埠这一带的农民主要的副业就是捕鱼。深夜，鱼儿都游出来了，吃食的吃食，游动的游动，捕鱼的人也在这时出动。二更以后，虾子也开始出来了。捉虾的人就划着小船，带着海兜去捞虾。天亮后，他们才吃一点冷饭团，到镇上去卖鱼虾，卖完了鱼虾才回来睡觉。但凡有一点闲时间，他们也不歇下来，而是筹划着演戏，在做戏时一显他们出色的本领。

在当时绍兴一带农村里，演戏的日子，简直多到数不清。正月的初九、初十是“灯头戏”；三月里，有“东岳大帝”生日，至迟不过二十八日就要演戏；五月十六日“王爷（土地）菩萨生日”，六月十七日“包爷爷生日”，都要演戏。七月十六日，“刘猛将军”的生日，农民们说他是“刘备的儿子”，因为到田间捉虾螭跌死的，更要演戏。八月里，九月里，一直到年底，还要演出不少的戏。演戏和他们的生活好像是分不开的。其实，他们演戏的目的倒不尽是为了给菩萨看的，不过是借此以表示自己的愿望：人口和牲畜的平安，五谷丰收，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

虽然，现实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

农民们总在迎神赛会这个属于自己的狂欢和示威的节日里显示才能、智慧和力量。队伍接连排成好几里路长，人群像滚滚的浪潮，席卷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在队伍的上空招展着红的，绿的，黄的，以及各种颜色的旗帜。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人人都像生龙活虎一般：有耍狮子的，有玩龙船的，有踩高跷的，有的抬着抬阁，有的敲着锣鼓，有的扛着荷花铤，轰，轰，对着天空放它几响的。

最壮观、最辉煌的要算是目连戏了。或许借此来纪念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封建统治阶级称为“叛贼”的英灵，和近代的参加太平天国武装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英雄们，以及其他的一些死于非命的横死者吧，在皇甫庄，戏台就搭在村子里一块叫做“火烧场”的地方。这里据说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反动地主阶级残杀农民的屠场。这戏从头一天的下午就做起，一直要做到第二天天亮。“起殇”是在太阳落尽的时候举行，台上吹起悲壮的喇叭，薄暮中，十几匹马，放在台下，一个演戏的人扮做鬼王，手执钢叉，此外还需要十几名鬼卒，普通的孩子们都可以应募。他们爬上台去，说明志愿，脸上涂沫几笔彩色，手拿钢叉，待人聚齐，就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那些无主的孤坟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

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责任这才完结，洗脸下台。举行了这一种仪式，就意味着那些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一同看戏了。

“起殇”仪式进去之后，戏文就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一到“跳吊”时候，人们立刻紧张起来。台上吹起凄凉的喇叭，台中央横梁上放下一团布。看客们都屏住气，台上忽然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脸上涂了几笔粉墨的男人，这叫做“男吊”。他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死守着蛛丝，又好像在结网，在这上面钻，挂。这之后，是“跳女吊”。台上又吹起凄凉的喇叭，不一会儿，门幕一掀，女吊——一个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低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了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然后，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们这才看清她的面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

“这之后的下文讲她做童养媳时备受虐待，终于只有投环自尽了。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也是一个女人，在含冤悲泣，准备自杀。她惊喜万分，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断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

三、初尝人世辛酸

鲁迅 13 岁那年，祖父因为科场的案件而下狱，这是他的家庭发生的一桩很不幸的事件。首先，在封建王朝统治下，一人犯法，则很有可能满门抄斩，这使得周家大小诚惶诚恐，鲁迅也就因为此事而去了大舅父家。第二，经济来源断绝，仅靠四五十亩水田，大家坐吃山空，生活日益窘迫；再加之狱吏役卒苛求勒索，使得周家一到秋天就害怕老太爷在秋审中遭到什么不测，只得赶紧凑一笔钱，汇到杭州和北京去托人设法营救。这样，一年一次，周家的经济力量就渐渐支持不住而濒于破产了。再有，周家是望族，一向受人恭维，现在老太爷下狱了，官没有了，远近亲戚不免有些势利眼，有的甚至投井下石，加以欺瞒。因此鲁迅的家庭，在经济方面和威望方面，完全破产了。就连鲁迅的大舅也要奚落鲁迅等孩子，称他们为“乞食者”，这使鲁迅在小小年纪便不禁常常悲从中起。

鲁迅家中自从遭受这次事变，他父亲性情也起了剧烈的变化，时常喝酒，发脾气，身体也慢慢地坏了下去。他本是一个十分严正的人，是同情“洋务派”的，主张富国强兵。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他的

耳里，他异常愤慨，面有忧色，还跟家人谈论国事，并主张待儿子长大后送他们到东洋和西洋学本事，以雪这番丧权辱国之耻。可是不久后，他就患上了水肿病。来给鲁迅的父亲诊病的是本城的一位“名医”姚芝轩，隔一天来一次，每次收诊费一元四角，这笔钱在当时已算不小的数目，所以诊费是相当贵的。而这位“名医”用药非常古怪，药引很难找。每换一次新方，鲁迅就要大忙一场，忙着到河边去掘芦根，忙着去搜求经霜三年的甘蔗，这样忙了约摸两年，可他父亲的病一点起色没有不说，反而日益加重，从脚背渐渐浮肿到小腿，以至于后来卧床不起了。姚芝轩看这情形，未免有些难堪，便向周家推荐了何廉臣。周家别无他法，只好又去请这位何“名医”。何廉臣的出诊费也是一元四角，他用药却比姚芝轩所用的药奇怪多了。比如药引要“蟋蟀一对”，并注明是“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这倒也难不住鲁迅，他到园中就可以捉来；就是那个“平地木十株”却着实为难了鲁迅等一千人，问遍所有人，只有那位爱种花木的玉田老人晓得，原来是一种生在山中树下的小树，能结小珊瑚似的红籽，这种树叫“老弗大”。药引费尽周折寻找来，然而还需制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可是，买来了，吃下去，还是没有用。这个“败鼓皮丸”吃了一百多天，依然没治好水肿。何廉臣又推荐

一个妙方：“我有一种丹，点在舌上，舌乃心之灵茵，想必见效，只需两块钱即可买一盒。”他的这个妙方未被鲁迅父亲所采用，看来周家已不再相信这个“名医”。为了开脱自己，何廉臣说了这么一席话：“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鲁迅的父亲仍然表示不相信。从此，何廉臣不再来了，鲁迅的父亲不久也就与世长辞了，事隔几年，祖父才从狱中被释放出来。

鲁迅那时已十四五岁，在周家是“长男”，因而生活的重担自然有一部分落在他的肩上。在这几年中，鲁迅几乎天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他从比他高很多的当铺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帐房先生凶巴巴，并带有侮蔑的眼神中接过钱，再去与他一般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回家之后，又必须忙着干这干那。他那黄金般的童年随着那逝去的流光，一去不复返了，他从“小康的人家”堕入了“困顿之中”。家庭的变故使鲁迅尝到世态的炎凉，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用两句话加以总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生活的困顿和繁忙，世人的冷酷和无情，并未打垮鲁迅，相反进一步地锻炼了他的意志和性格，以及

他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的能力。自从他父亲去世后，鲁迅就再没有到三味书屋读书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他的学习。在这段时期内，他着手搜集和整理有关乡土文献的古代历史、地方志，访问绍兴府属的名胜古迹，抄录和拓印碑碣文字；有时登上城西的卧龙山，瞻仰那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所的越王台；有时凝望那东出稽山门，折向南流的若耶溪，在那条清澈如明镜的溪水上，大诗人李白、杜甫、陆游等都曾经尽兴遨游。若耶溪的尽头是禹陵，那是最能够象征我们民族的勇敢和勤劳，开辟草莱的夏禹葬身的地方，西出偏门不远就是鉴湖上的宋代大诗人陆游的故居——快阁；从快阁折向西南，那就是历史上以风景秀丽著称的“山阴道”。在这条山阴道上，最使人留恋的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曲水流觞，修碑赋诗的兰亭。山巅和山腰掩映着茂林修竹，潺潺的溪水从林中倾注而下，流向那繁花满布的田野。盛开的杜鹃花——映山红在对面的山上浮起一层绯红的轻云，染红了山。……祖国美好的河山，令鲁迅非常神往，又使他忘却了生活的疲惫和艰辛。面对人世的变故，鲁迅变得坦然和了然，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当时，三味书屋的学生们也都各自走进了社会。有的走入钱庄去学生意，有的回到自家开的丝绸店去

做小老板，有的则到外地去学做幕友，……这是当时绍兴破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惯走的几条道路。但是，鲁迅却选择了既不愿做幕友，也不愿做商人的另一条道路，他打算到当时开办不久就受到全城守旧派攻击的中西学堂去继续求学。但当他详细探听之后，这个学堂并不令人满意。那里的功课，除了汉文、算学、美文、法文之外，就没有了别的课程。而功课较为别致的，是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却又去不起。无须学费的学堂在南京，他于是打算去南京。于是，鲁迅就被与他住在一同台门里的叫周椒生的叔祖携同其子去了南京求学。当时，鲁迅的母亲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交给了他，说是由他自便，而且她哭了。因为当时一般人认为进“洋学堂”，学“洋务”，那便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要受到奚落而且排斥，何况她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可是，鲁迅不顾这一切，从困顿中站起来，毅然跨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门槛，去了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

　　这年，鲁迅18岁，把原名樟寿改为树人。这一年，正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

　　自从1840年，封建中国的大门便随着英、法、美等国的坚船利炮向外国侵略者敞开和加大。清政府的“天朝”迷梦被打破，那些腐朽昏庸的上层人物，

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淫威，丧失了往日的威风，只好与“强盗”们狼狈为奸，甚至为虎作伥，欺压国民，侵占土地，掳掠财富，构成了一幅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的图画。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惨败，次年订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鲁迅的心里烙上了深深的悲痛。18岁的鲁迅来到南京，与其说是给他个人找生路，不如说是给中华民族找生路。民

族危机、社会危机给鲁迅以强烈的刺激，使他的心思不能不从个人出路与中华民族的出路在生活实践中取得统一。

鲁迅来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戊戌变法运动猛烈高涨之时。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是从封建地方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具有变化维新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要想改革腐朽的不适合“世界潮流”的旧制度，建立一套新办法、新制度。但这种改良主义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很不彻底，并不能拯救民族危机，但是，在当时这种主张却有它的很大的进步意义。在它的影响下，兴建了很多新学堂，进步的文化思潮在这里得到传播，新的报刊和书籍陆续出版。正是在这个时候，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的一切设备和措施，都令人觉得它

不过是封建主义的躯体，这躯体被一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外衣包裹着。一进仪凤门，就可以看见这学校里有二十来丈高的旗杆。这旗杆很有意思，如果有人爬上杆顶，就可以看见狮子山和莫愁湖；危险性也没有，因为下面张着网，跌下来也摔不厉害。此外，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高烟囱了。在学堂的后面有个被填平了的地方，因为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所以在鲁迅到来之前，池子已被填平了，而且还造了一座小关帝庙加以镇压，而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还有一群和尚被学堂当局请来放焰口，这就使得鲁迅不久就觉得这学堂充斥着乌烟瘴气。

学堂里的功课，一星期中有四整天是读英文，一整天读汉文，一整天做汉文。鲁迅学习很刻苦，而生活也过得十分不容易。这里虽说是公费，吃饭、制服、住宿、书籍都是由学堂供给，但是，给学生的津贴却是很少的。这些津贴是买不了什么像样的东西的，而鲁迅自己又没有钱，到了冬天，他只好穿着夹裤过冬。而南京的冬天又十分寒冷，他就养成了吃辣椒取暖的习惯，进而成了嗜好，因此他的胃功能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渐渐地，鲁迅对江南水师学堂不满情绪日增，第二年就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去学开矿了。在路矿学堂里，情况有些改变。在水师学堂学

的是英文，在这里却学德文，另外还要学算学、物理学、金石矿物学和物理学。因为这些是以前没有学过的，所以，鲁迅感到非常新鲜。在这里，鲁迅还自学了有关生理学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书，这使他回想到父亲的病并开始认识到庸医骗人的可恨。

鲁迅来到路矿学堂的第二年，校长换成了一个坐在马车上时要看《时务报》的“新党”。有一次考汉文，新校长出了一个题目——“华盛顿论”。这可难煞了汉文教员，不禁紧张兮兮地求教他的学生们：“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由于看新书的风气日益流行，鲁迅就有了接触进步思潮的机会。引起他莫大兴趣的一本书是《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宣传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由我国著名维新派代表人严复于1896年翻译过来的。书中物竞天择的新思想使鲁迅再也不能平静下去。它使鲁迅联想到中国受外国人欺凌的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如果中国再按照以往陈旧的方式生活，在目前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是无法再生存下去的。要想脱离这个残酷的现实，必须坚决地把那些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抛弃掉，必须奋起直追，抓住那些合时宜的，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东西，并且决不向外来侵略者投降。惟其如此，中国才有希望。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爱国者，鲁迅接受了达尔文进化

论的思想，在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经常使用这个武器，直到后来他接受了更新的、更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

鲁迅在路矿学堂里一直学到1902年，算是从那儿毕业了。但是，他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毕业，自然是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杆，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鲁迅又面临一次选择，该到哪里去呢？当时的中国，维新浪潮已经低落下去，清政府里的顽固派继续向侵略者投降。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城，1901年签定了城下之盟——《辛丑和约》。对内，清政府却采取高压的政策，镇压义和团运动，即使对于那些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也要请他们去上断头台。国内真是一片黑暗，这对于寻求科学和维新真理的鲁迅来说，到国外去，倒是一条较为适合的路。

四、东渡扶桑

1902年，鲁迅22岁时，江南督练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鲁迅被选派。该年四月，鲁迅与三位同学和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俞明震乘船东渡去了日本。到了日本，鲁迅先在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文。他所在的班称为“江南班”，共有中国留学生十多个，他们都准备在学好日文之后，再分别学其他的专业。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聚集在东京。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在花下就时常出现一些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把制服的帽子顶得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这样散了辫子，盘得平平的，除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显得标致，很引起鲁迅的反感。鲁迅就跟他们完全不同，他到了东京之后，不久就毅然把辫子剪掉了，成为“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在东京，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会馆。那里有卖新出的书报的门房，鲁迅有时也去那儿光顾，有时还会进里面坐一坐。一到傍晚时分，就有一间地板经常咚咚直响，弄得满屋都是烟尘，有些知内情的人说，这是留学生们在那里学跳舞。

鲁迅初到东京时是比较寂寞的，他就用读书来消除寂寞。《天演论》、《群学肄言》、《茶花女遗事》等，都是他爱读的书。此外，鲁迅又浏览了当时被翻译过来的一些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他浏览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但鲁迅并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现实的社会问题对他来说则更富吸引力。许寿裳是鲁迅在东京新认识的朋友，他们俩凑在一起就会谈一谈人性，谈谈国民的缺点以及它的病根，以及如何去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在东京，鲁迅也时常参加一些公共集会。在集会上，他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投机政客的一些言行，特别感到厌恶。有一次，鲁迅看见一个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调讲演反清的青年，他讲得真是激昂慷慨，似乎令人有点肃然起敬，可是到后来却越讲越不行了。当这位青年自以为很得意地说到“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清政府中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的时候，听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认为他是在打诨，接着便纷纷地走散了。这一个很恶劣的印象，在鲁迅的记忆里保持了一个很长久的时间。当时，在鲁迅心目中的真正革命者是孙中山和章太炎。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派影响了东京，新生的革命力量生长起来。一九〇三年，章太炎、陶成章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光复会，由江苏、浙江籍留日学生为基础，

鲁迅后来也成为它的会员。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之所以是鲁迅认可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指出，留学青年们不能忘记祖国的灾难，要推翻当朝的腐朽的清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才能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当时，浙江省的留日学生所出版的刊物是《浙江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个刊物的编者之一，后来，鲁迅也成为《浙江潮》的经常的撰稿人。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最早的关于文学和科学译著，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和他那有特色的爱国主义。在他译述的《斯巴达之魂》一文中，鲁迅向那些因抵抗外来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表示了他的极大的尊敬，他写道：“巍巍乎温泉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他还特地赞扬了那些年青的斥责她的丈夫生还的妇女，用以鼓劲当时的中国青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鲁迅特别赞扬斯巴达人尚武精神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表达他对外来侵略的反抗情绪。

在给《浙江潮》的撰稿中，鲁迅还热心于介绍自然科学。他译述了《说（牟日）》，是一篇介绍发现镭的经过的科学论文；此外，还译述了科学小说《日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还有一篇科学论文《中国

地质略论》。与此同时，鲁迅和友人颜琅台编了《中国矿产志》，论述了当时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鲁迅认为，科学与爱国是紧密相联的，科学可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可以找到爱国的途径。鲁迅这种爱国方式是与别人不同的，别的留学生的活动大都偏重政治，而他把重点放在了科学上。自然科学和社会改造的事业，在那时的鲁迅的思想里最初地发生了联系，这可以算是鲁迅的对于科学和文学的最初的观点。

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了两年多日文，鲁迅选择了医学作为下一步学习的主攻方向。1904年秋天，鲁迅离开东京，来到了那个僻静的镇市——仙台。

鲁迅选择学医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因为父亲的死。他的父亲就是被那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庸医所耽误，这件事引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病人家族的同情。其二，当时，中国也就是因为落后和无知才被外国侵略者肆意欺凌和摧残。这是鲁迅所亲身感受到的，也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打算学成后回国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耽误的病人，或是在战争时候当军医。鲁迅又从当时被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些片段，知道日本的发达是与西方的医学有关的，他希望能用医学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从昏暗愚昧的落后状态中拯救出来，用科学促进祖国的独立和富强，用科学来反对保守和迷信，并为人们创造幸福的生活。

基于这些想法，他就决心来到这所偏僻的、日本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来学习了。这些都反映了鲁迅对祖国深厚的爱和浓郁的担忧。他的一首七言绝句正是他心灵的写照：\$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因为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里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不多，所以鲁迅在生活上受到学校的优待。例如，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鲁迅起先是在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里，虽然已入冬，但蚊子却还很多，便就用被子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呼吸，蚊子无从插嘴，居然也睡安稳了。因为鲁迅住的是监狱旁，所以有一位先生觉得这客店也包囚人的伙食，对鲁迅是不相宜的，多次劝鲁迅搬走。盛情难却，鲁迅只好搬到离监狱很远的地方，可惜饭食却大不如前，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在这个学校里，鲁迅不但接触了许多陌生的教师；听到许多新鲜的课程，还认识了一位藤野先生。藤野先生黑黑瘦瘦，戴着眼镜，留着八字胡，穿衣服很不讲究，有时竟忘记打领结；冬天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据说有一次在火车上，被管车的怀疑为扒手，叫

乘客小心。藤野先生少年时代曾跟他的老师野坂先生学过汉文，所以对中国古代先贤极为尊敬，对于中国学生也就十分亲切和蔼。他起先教骨学，上讲堂就将挟着的一迭大大小小的书放在讲台上，用缓慢而又很有顿挫的声音，向学生们介绍自己：“我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接着，他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起到那时止的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过了一星期，大概是星期六，藤野先生将鲁迅叫到他的研究室，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问：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可以抄一点。”鲁迅回答说。

“拿来我看！”

藤野先生收下了鲁迅的讲义，过两三天就还给了鲁迅。可能因为鲁迅在当时入学不久，还不能充分听懂他所讲的日语，在笔记上会有一些错误。于是他就吩咐此后每一星期要把所作的笔记送给他看一回。

鲁迅感到感激和不安。藤野先生不但定期收他的讲义，而且每次都把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至尾用红笔添改过。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还订正文法上的错误。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有一回，藤野先生将鲁迅叫到他的研究室，翻出

他所抄的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它，和蔼地对鲁迅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可是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樣的，我们没有法改换它。现在我替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这更增加了鲁迅对于老师的尊敬和感激。

在鲁迅的勤奋和藤野先生的帮助下，在仙台的两个学期中，他在学校的成绩居中，没有落第。

后来藤野先生担任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的功课。上解剖实习大约一星期后，他又派人叫鲁迅了，很高兴地用着抑扬的声调对鲁迅说道：

“因为听说中国人很敬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鲁迅受到藤野先生如此的重视，因此也就遭到一部分学生的歧视，侮辱无端的飞来。虽然当时距中日甲午战争已有10年，但是，在学校军国主义教育培养下，在一些抱着狭隘的民族思想的日本学生眼中，中国人的地位依然是低下的。他们把中国留学生叫“清国奴”。

有一天，鲁迅的同级学生会干事来到他的寓所，借鲁迅的笔记看了看后就当场还给了他。他走后不久，鲁迅收到了一封很厚的匿名信，拆开来看，第一句

是：“你改悔罢！”这是《新约》上的句子，但新近托尔斯泰曾经引用过，所以也就新鲜了。（当时，正是日俄战争之后，托尔斯泰曾写信给俄国沙皇和日本天皇，开头便是这一句。）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的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了，所以才能有那样的成绩。鲁迅这才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因为要开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通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加了一个圈。鲁迅当时并未介意，还觉得圈的可笑，现在，他才悟出那个“漏”字是讽刺他的，就是说他得了教员泄漏出来的题目。但是，鲁迅是不可侮的，他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然后就向学生会干事提出强硬的抗议。有几个和鲁迅相熟的日本同学也抱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无理，并要求他们把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最后，流言终于被消灭了，学生会干事又竭力运动，要求收回匿名信，鲁迅于是就把这封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在那些充满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学生们看来，中国是弱国，中国人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本领了。这对于当时身为弱国国民的鲁迅无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刺激。

不久，当鲁迅在这学校里求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件事使鲁迅的思想引起了非常强烈的

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如鲁迅自己所说的，他深深地感觉到学医并非一件最紧要的事。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当时，他认为第一主要的，是在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想到要提倡文艺运动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一学年，学校添教了细菌学。教这一门课程，细菌的形状全是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但还没有到下课的时间，便放映几段时事的片子。这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所映的大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宣传战胜俄国的情形。恰巧，在一部影片里，却有中国人夹杂在里边；据解说是：一个中国人给沙皇军队做侦探，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了，但围着看的却是一群中国人。这当然是污辱！这时，在讲堂里只有他一个人是中国人。“万岁！”除了鲁迅之外，所有的人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完一部片子都有的，但这时，在鲁迅听来，这呼声却特别刺耳。这以后，好几天，他都不能平静下来，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心中十分苦闷，真是茫然若有所失。有时他一个人跑到深山里放声唱歌，发泄心头的苦闷。有时一个人躺在草地上，苦苦地思索着：为什么一样是茁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围

观着自己的同胞被杀，而竟无动于衷？！这一个刺激是极为深刻的。在后来，鲁迅曾多次把从这次得来的印象，作了某些艺术加工，写入自己的作品中。在小说《示众》里，有类似这样的场面，在《药》里有类似这样的场面，在《阿Q正传》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场面。自然，上述的一些场面和这里所提到的事实是完全不同的；鲁迅在创作上述几篇小说时，对于他的最初所获得的印象都作了一些改动，但是，他在刻划那些观众的麻木的神情时，在精神上却是有其相似之处的。

就在这一年的春假，当鲁迅从仙台回东京时，他就和他的朋友们商量要弃医从文的事。

“我要退学了。”鲁迅对许寿裳说。

“为什么？”许寿裳有点怀疑，“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鲁迅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到了第二年的终结，鲁迅终于去见藤野先生，告诉他说自己不想学医了，并且想离开仙台。藤野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没有说出来。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鲁迅看到藤野先生有些凄然，便说了一句安慰他的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没有什么大帮助。”藤野先生叹息说。

鲁迅离开仙台的前几天，藤野先生又把他找到家里去，交给他一张相片，在这相片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

对于这一位正直的善良的、诚心诚意把自己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学生的藤野先生，鲁迅一直都怀着深厚的敬意。

1906年的夏天，鲁迅从仙台又回到了东京，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活动。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在东京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一个叫“伏见馆”的公寓里，租屋住下。住了约半年多，他又搬到附近的东竹间的一家人家里去住，后又迁居到一家叫做“中越馆”的客店，在那里，一直住到1908年四月，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从当时的国内条件来看，开展革命文学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反动腐败的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使得人民完全生活在无权的状态下。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迫使一些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活动不得不在国外进行。而日本也就成为许多革命者站脚的地方，而当时的东京则成为他们的政治、文化中心。

在东京，鲁迅过了一段平静而无拘无束的生活。早晨起得不早，洗漱之后，吃点心，看报纸，到了中

午吃午饭。饭后，就有朋友来谈天，来他的寓所最熟的朋友是当时光复会的一些会员，其中包括副会长陶焕卿（成章）。陶是当时一个和下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家，他经常穿一双草鞋，腰间勒条草绳，往来于浙东一带的农村里，一天跑八九十里，在会党中间进行秘密的反清活动。如果没有朋友来，鲁迅就去附近的书店走走，看是否有合适的书要买。夜里他才开始学习工作。他喜欢在煤油灯下看书，没有人知道他会看到什么时候。经常是其他同住的人们都睡熟了，他还没有睡。

1907年，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秩序已经不稳，虽采取各种高压手段，但革命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在东洋的一家日文报纸刊登了一则从中国拍来的电报，报道清政府的安徽巡抚恩铭被 JoShikiRin 刺杀了，刺客被当场捕获。这个震惊国内外的消息立刻在留学生中间传开了。而这“JoShikiRin”便是当时正做安徽候补道的革命党人徐锡麟。不久，与徐锡麟有着密切关系的女革命党人秋瑾在绍兴被杀，徐锡麟的两个学生陈佰平和马宗汉被杀的消息纷纷传来。并传说恩铭的亲兵将徐锡麟的心肝挖出炒食干净。由于愤怒，东京的留学生秘密开会，筹集了一些川资，派人回国去接徐锡麟的家属。

浙江省的留日学生还在东京开了同乡会，追悼革命烈士，并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惨无人道。鲁迅也积极参加了追悼会。而鲁迅则主张不是暗杀的手段，而是改造这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的、持久的、韧性的战斗，是用文艺来燃烧起这沉默的国民精神的火花。

鲁迅所选择的革命道路和徐锡麟不同，采取的革命手段是文艺运动。

这件事过后，鲁迅依旧住在中越馆。秋天晚饭过后和几个朋友步行到神田骏河台，跟一个因避难逃到日本的俄国革命党人孔特夫人学习俄文；但没多久，由于陈子英退学走了，接着陶望潮又到长崎去秘密学习制造炸药，也走了，于是学习俄文的事情就终止了。鲁迅仍然留在东京，和他周围的几个朋友，继续他的工作，筹备出版文艺刊物。

鲁迅的计划，第一步是出杂志。这杂志的名称都已经想好了，叫做《新生》——新的生命的意思；甚至连稿纸都印出来了。正当《新生》出版日期快要接近时，封面、插画都准备好了，却发生了周折，写稿的人走了，出版印刷的资本家也逃走了，最后只剩下鲁迅和他的两个友人。于是，第一步计划《新生》就这样流产了。这对于鲁迅的最初的文学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冷漠和失败。

在当时的东京，虽然是中国进步的和革命的势力活动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些保守的和反革命势力的活动场所。进步的和保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创办了同盟会，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报》。由当时在学生中有极高声望的革命家章太炎为主编者之一。而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为首的保皇党——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也拥有一些读者。鲁迅从他最初的革命的文艺活动时起，就站在革命民主派最坚决最彻底的行列里。但是，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热烈反应和支持，所以《新生》的流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这时感到了社会的冷漠是可怕的，它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这是怎样的寂寞呵！自此以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鲁迅感到了“未尝经验过的无聊”。虽然第一步失败了，但他又准备起他的第二步：翻译介绍俄国的和东欧的（在当时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他又为《河南》杂志撰稿，这是一个当时已经出版的反清的革命刊物。在既有的阵地上，鲁迅宣传他对于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主张，以此来发挥战斗力量。

鲁迅特别关注那些对于世界上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学。当时，鲁迅已经能够读日文和德文的书籍了；于

是就从日文和德文入手，搜集了一些可作为翻译介绍的材料。只要他的身边有一点余钱，就要到神田的中西屋，日本桥的丸善书店，或是本乡的南江堂这一些书店走走，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书籍和杂志可买。他每次总是要买一两本旧书和杂志，有些在东京比较难得的书籍，他就托丸善书店到欧洲去购买。对于新出版的介绍俄国文学的杂志，他特别看重，一到出版日期，就忙着去寻找。他买来后读完，还要把里面的文章拆下来保存，以免散失。他又通过查考德文、英文的书目，设法购买俄国、捷克、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作品。鲁迅最喜欢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死魂灵》、《狂人日记》……等作品，这些书曾给予鲁迅以极深刻的影响。另外，鲁迅还喜爱和尊敬像高尔基、契诃夫、科罗连诃等作家，以及波兰作家显克微支，他还爱读《你往何处去》这部书。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集和小说《绞吏之绳》的德文译本，是鲁迅特地委托丸善书店从德国买来的。鲁迅简直把它们当作珍宝，时常带在身边。鲁迅所喜爱的西方国家的作家如英国的拜伦和雪莱、德国的哥德和海涅。而对于当时日本文学中的自然主义的作品，鲁迅并不特别注意。他只是爱读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鲁迅的注意力是放在当时日本的一些勤恳的西方文学的研究家和翻译家的批评和研

究的文章上面。

作为一个青年思想家，鲁迅在当时已经显露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他一开始就把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当时的风起云涌前赴后继，推动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人民群众——其中特别是农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他们的思想情绪，在当时的鲁迅的思想中和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他的思想不仅客观地反映着当时的现实，而且还强烈地反映出要改造这现实的倾向。在他的文学活动最初的时刻起，鲁迅就把他的革命文学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在当时，东京的爱国主义情绪正在高涨，国际国内形势咄咄逼人。《河南》杂志在它的《发刊辞》上，说明该刊的发刊的目的时写着：“因睹外患之迫于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肠，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在这篇“发刊辞”里，又写道：“为生为死，即在今日。为奴为主，即在今日！”鲁迅就是在这种革命激情下，开始为该刊写稿的。在任何一个革命斗争中，鲁迅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他使文艺这支武器，用文艺的火花，在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心灵上，燃起斗争的信念；促使被压迫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压迫他们的压迫者，把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从濒于灭亡的危险中拯救过来。反对压迫和

侵略，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这就是鲁迅的文学活动最基本的中心思想。由于他对一切压迫者，侵略者总是抱着不妥协的反抗态度，热情地参加人民革命斗争，以革命文学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因此青年思想家鲁迅和当时一切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浅薄的“富国强兵”论者，在思想上划开一道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

鲁迅在1907年和1908年出版的《河南》杂志上揭露了当时一些所谓的爱国志士，他们假借福国利民的美名，做着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事；而表面上好像是个决心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但暗中却准备去当亡国奴，他们就是后来的丑恶、无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辈。中国如果真的灭亡了，他们也还是能够苟延残喘，并且混水摸鱼，趁机捞上一把的极端自私自利主义者。这一群无耻的市侩，他们在还没有觉醒起来的群众面前飞扬跋扈，仿佛像个“英雄”，但是，他们一旦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枪炮或者钱袋，却又表现为一个孬头。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鲁迅看透了他们的灵魂，并加以辛辣的嘲笑和攻击，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实际上，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为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不想根本推翻

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而只是把已经陈旧的门面粉刷一番。他们所看到的，除了枪炮不如人，轮船、机器不如人，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不如人，认为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中国是要被列强所征服的。他们的办法是所谓“富国强兵”，是“君主立宪”，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挽救那垂死的封建制度，而他们也依靠着这旧制度保全了自己的地位，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想寻找出一条保存封建主义制度的道路，同时也就是一条适合于自己利益的道路。鲁迅针对这种情况，在《文化偏至论》里，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新踣境，人心始自危，而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竟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首事。”

鲁迅又指出了改良派所主张的议会政治的真面目，由政客而变成议员，不过是千万的“无赖之尤”：

“盖国若一日存，固足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全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中较善者，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

姑给他人之余绪，思鸩在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攘，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愿见诸实事，将事权言义，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钝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搢，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裼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何与焉。”

在这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诚若为今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妥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

鲁迅的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最激进的主张。从整个的政治倾向上来看，无疑地，这时鲁迅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鄙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他的社会观点、政治态度、思想体系与资产阶改良主义者不大相同。他对于封建制度采取了不同于调和的态度。虽然在当时鲁迅还没有接触到最革命的阶级和接受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生产状态落后，还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出现，致使他的

思想受到限制。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个充满着战斗色彩的反封建主义和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天才思想的萌芽。

鲁迅反对妄自尊大，反对盲目崇拜过去，彻底反对落后和保守，反对盲目崇拜外国——资本主义的反动文化，反对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阿谀逢迎、奴颜婢膝的投降主义态度，这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的鲜明的特点之一。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提出了既要反对“抱残守阙，以底于灭亡”的顽固思想；同时也反对“言非同于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于西方之术弗行”的奴化思想。他怀着热烈的愿望，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关于人的个性的解放。他主张：要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他认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然后“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鲁迅的爱国主义特色，也表现在他对于文学艺术的观点中。他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反动倒退的复古主义。在《摩罗诗力说》中，他指出：“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闾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他赞扬在人的自觉的基础上发出来的反抗

的声音。“正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他提倡“摩罗诗派”，“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人之”。通过介绍雪莱、普希金、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诗人，以表达他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独立自由的向往，而对于当时的人民还没有觉醒起来的情况，鲁迅则感到颇为寂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就是他在当时的悲愤的情绪。他热烈地期望着“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来打破“中国之萧条”。他焦急地在寻求，“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想到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卓越的战士科罗连珂在《末光》中所描写的，住在西伯利亚列那河畔“十二月党”人的后代，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情景。鲁迅结尾写道：“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1908年4月，鲁迅迁出了中越馆，和许寿裳等五个人，合租了一所住宅，并取名“伍舍”。这所“伍舍”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这是一所颇为华丽的房子，曾是日本大文学家夏目漱石住过的，庭园广阔，花木繁茂，整洁美观。西片町离小石川区民报社不太远，坐电车一会就到了。鲁迅认识了章太炎，并且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章太炎当时正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当时发表在《浙江潮》和《民报》上鼓吹反清的一些文章，在留日的

学生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当时的名声很大，他替反清革命家邹容的小册子作序，热烈地攻击清政府，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到日本东京办报和讲学。鲁迅跟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这是因为鲁迅向往他那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就在鲁迅跟着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他的计划的第二步，着手把一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捷克的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材料，编印了两册《城外小说集》。他的这些工作，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古典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对促进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发展和成长，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这使中国人民最初看到了沙皇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觉醒起来的工人阶级：他们正在行动起来，改变着历史的面貌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极其生动的榜样。正如鲁迅后来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说的：中国人民从“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

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有着血肉关系的，中苏两国人民的“文字之交”，反映着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俄国人民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他们的英勇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激动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渴求解放的心。在鲁迅的整个光辉的革命文学事业中，翻译和介绍的俄罗斯、苏联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经鲁迅和其他翻译工作者的介绍，对于争取解放的中国人民起着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鲁迅双手建立起来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文字之交”。

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八年中，已给他日后的思想和革命事业、文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已选定了献身革命事业的道路，即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色彩鲜明地把他的革命文学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密切地结合起来，用文学作为武器，为祖国和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鲁迅是第一个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中间站起来的作家。

鲁迅和友人们筹集了一笔钱，先试印俄罗斯和东欧作品的《域外小说集》，卖出后收回钱，再继续出下一册。这样继续下去，可以介绍各国的名家作品。可是选择的两个寄售处——东京和上海，都卖得不好。东京第一册只卖了21本，第二册是20本，而上海

所说第一册卖也不过 20 本，以后就再也没人买了。于是后面的册子也就无钱印制了，这样印成的书便堆在寄售处堆货的栈房里。

鲁迅的文学活动的第二步计划也没有按所理想的实现。

这时，鲁迅的母亲和周作人夫妇希望他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他必须回国找工作做，于是在 1909 年夏天便回国了。

五、黑暗中的苦心摸索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比他早些回国，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务长。经许寿裳向校长沈钧儒推荐，鲁迅被聘请做教员，担任初级师范化学和高级师范生理卫生学的功课。由于当时有些日本教师在这学堂里教课，所以鲁迅兼任博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翻译工作。这时，鲁迅不得不暂停他的文学活动，而是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出现在学生们中间。

虽然博物学工作既繁琐又枯燥，但鲁迅的工作却受到了学生们的极大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十分优美，很受学生们欢迎。特别是讲的生理卫生学，学生们要求鲁迅加讲生殖系统。这在当时充满封建气息的清末学堂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鲁迅却坦然地去讲授了。鲁迅认为，学生们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他就应给予满意的答复，所以他的讲课很受学生们的喜欢。

课外的业余时间，鲁迅自己研究植物学。他经常带学生们去采集植物标本，鼓励学生们研究植物，指导学生们如何采集，记录，保存这些植物。

另外，鲁迅的另一件重要工作，那就是阅读搜集到的文艺书籍。他往往读书到很晚才睡，陪伴他的是

“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有意思的是，学校里照顾他的工友，每晚摇响就寝铃前，先替他买好这两样东西，如果是星期六的夜间，就要准备得更充足一些。

鲁迅任教一年后回到了故乡绍兴。

回到绍兴后，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做学监，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教员，校长是他在日本东京时的朋友陈子美。鲁迅以严厉出名，学生们都怕他，他对学生则爱护备至。等到学生知道他是革命党了，因此起了敬意，但同时又受到当时绍兴知府的注意。那时革命的势力正在日益高涨，反动政权因此也不敢公开地对他加以迫害。

课余，鲁迅仍旧继续他的采集植物标本工作，并搜集抄录了中国古代有关植物类著作，如《南方草木状》、《释草小记》等书。

鲁迅当时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辑录唐以前的有关越中史地的著作和唐朝以前的小说。这就是后来印行的《会稽郡故事杂集》和《古小说钩沉》的发端。

曾有一个短时期，鲁迅赞助孙德清在绍兴办报，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不久杭州和绍兴也光复了。当时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时，在绍兴城内立即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这个庆祝大会的主席就是鲁迅。

一天，街上谣传杭州残兵要渡过钱塘江来到绍兴，造成城内人心浮动。鲁迅立即召集全校学生组织了一个“武装演说队”，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意义，在大街上散发传单，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了。这年冬天，鲁迅写成第一篇试作文言小说《怀旧》，系以东邻富翁为模特儿，写出在辛亥革命前夜，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秃先生）闲谈，商议迎降的事。颇富讽刺色彩。虽然试作，却又透露出鲁迅的创作天才，表明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从此证明鲁迅对于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任务，是没有忘怀的。

绍兴光复后，王金发带领起义军进入了绍兴，他们受到全城人们的热情欢迎和慰劳，过了一两天，王金发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宣布自己的主张，他就任这个军政府的都督。这时，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的朋友范爱农做学监。鲁迅到学堂和全体学生见面的那一天，他穿一件灰布棉袍，头上却戴一顶军帽，精神十分兴奋，谈话简明有力，学生们和庆祝革命成功一样，欢迎新校长，情绪十分高昂。

辛亥革命的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光复后的绍兴给鲁迅的印象是：“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这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铁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范爱农》）

又如绍兴的都督是“绿林大学”出身的豪杰王金发，初进绍兴城时，还算顾全大局，采纳舆论，不久也就被许多闲汉、士绅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其腐败都督。不但看不出有什么革命的政治措施，反而摧残进步力量，以武力恐吓进步舆论。

王金发拨给绍兴师范学堂的经费是两百块钱。一天，一个青年来找鲁迅，他们要办报纸来监督王金发等人，请求鲁迅作发起人，鲁迅未推却。几天后，报纸出来了，大骂绍兴军政府和里面的人员；此后又骂都督及亲戚、同乡、姨太太……过了几天，王金发便叫人送了五百块钱到报馆来，于是这班青年便收了这钱，而且继续骂。这件事鲁迅先生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当鲁迅写信去催学堂经费，又取了两百块钱。王金发仿佛有些生气了，给了钱吩咐说：“再来要，没有了！”这时，鲁迅才从范爱农那里得知那五百元钱的事。于是，鲁迅立刻到报馆核实了真相。鲁迅就略说了几句不该收王金发的钱的话，引起一个名为会计员的不高兴，他质问鲁迅，鲁迅就不再和他向下说了，否则，第二天的报纸上就会骂他如何怕死。

鲁迅在这样的局面下，只好作战略转移的打算了。事也凑巧，许寿裳已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来信催鲁迅到南京去。于是，鲁迅先到都督府辞了职，而后于1912年1月来到南京。

原来，许寿裳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那是由于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而去的；许又向蔡推荐了鲁迅，于是蔡元培就托许寿裳写了两封信请鲁迅到教育部来做部员。

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在各方面都逐渐显露出来。许多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阵营，一跃而为新贵，攀折革命的花木，采摘革命的果实；这块刚刚挂起的“民国”招牌，不等到涂饰的新漆脱落，它的旧相就显露出来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志士反而遭到了猜忌和暗害。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焕卿，在南京的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暗杀了。

在教育部里，鲁迅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他就利用这时间抄书。他从当时国内藏书最为丰富的南京蟠龙的国学图书馆借来《沈下贤文集》，抄出了其中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等篇，这些后来都编入他所辑录的唐宋短篇小说集《唐宋传奇集》里。有时，鲁迅也偶尔和他的旧时的同学，出去探访一下过去驻防旗营的遗址，它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了，剩下的几间破屋，门窗也都残缺不全，情形十分凄凉。1912年5月，在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时，鲁迅也随教育部一同北上了。

临时政府的北迁，表示着刚刚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他们面对着革命的敌人妥协投降了。

袁世凯对于这次革命本来就是没有诚意的。他有帝国主义撑腰，因而一个筋头从清朝政府的北洋大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在“五色共和”的旗子下面，加紧向革命势力进攻。他在暗中密密布置爪牙，准备消灭当时的一切进步势力。“莫谈国事”的纸条贴满了北京的茶馆、酒楼、客栈。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到处充满了杀机。鲁迅在北京的这几年里，所看到的是如何“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袁世凯对革命者及其党人，杀，杀，杀，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

鲁迅到了北京后，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职后，即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他知道鲁迅研究美术和教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又被任命为佥事。鲁迅在这样的环境里，无所作为，所以他仍旧抄书。在这“官场”及会馆里，鲁迅碰到不少找他办事、借钱、请求“旌表”的人。对于这些，他实在是不欢迎。鲁迅就在这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陆续抄写并且校勘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更有系统地辑录了散在各种“类书”中间的唐以前的古小说；六朝时代大诗人稽康的诗文集也是在这时开始校寻的。此外，鲁迅又翻译了一些关于论述儿童教育和美术教

育问题的文章，但是他的更多的时间，却是用在研究佛经和收集碑拓片上面。那出售旧书和碑帖拓片的地方——琉璃厂，差不多每隔几天，他就要跑去一次。鲁迅研究佛经，只是把它当作人类思想史上的材料来看待，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的。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来，他认为历史上那一种佛教的精神是已经过去的东西，它是永远不会复活起来的，而人类的进化则是无穷的。鲁迅研究碑帖拓片，也有他自己的独创的见解，过去一般人的研究，向来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字上面，对于拓片上的图画，很少留意，而鲁迅却在这上面花了许多工夫。鲁迅认为可以从中看出古代人民生活，是价值很高的古代艺术作品。

过了4年，鲁迅从原来的叫藤花馆的地方移居到会馆内的另一个叫补树书屋的小院子里。鲁迅继续他的辑录、收集、研究工作。但他对于现在的生活越觉不满了。

鲁迅感到特别寂寞。他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生活使鲁迅和人民隔开了，而他却深深地关心着人民的命运。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而他对于这次革命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他是要寻求一条出路的，可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寂寞难以忍耐，不可驱除；这寂寞使他感到悲愤，可当他冷静地看看四周，他却感到仅仅愤懑是没有用的；经验催促他，

使他自己不断地、深刻地反省着。

然而，时代并没有忘记鲁迅，它殷勤而又关切地召唤着他。

有一天发生的事情，使鲁迅又拿起了他的武器——笔。并于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5号上，发表了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这天，鲁迅正在抄古碑，一个老朋友走来了，他将手提的大皮包向桌上一放，脱下长衫，对面坐下来，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这人就是当时正在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他翻开鲁迅的古碑抄本问道。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

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那时正在办《新青年》杂志，正竭力地寻求友军。于是，鲁迅便说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之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

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煞的。这也给鲁迅重新点燃了希望，希望在于未来。

六、打破沉默，领导新文化

《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在鲁迅的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但直接引起他要把一个“狂人”作为模特来写一篇小说，则是当时一件新发生的事。当时鲁迅写作的目的，想从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那里发生的简单的事件，“发生开去”，把“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并且“设法”加以疗治。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通过对一个“狂人”的描写，把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借着小说里的“狂人”的嘴，对于封建家族制度的历史传统加以攻击说：在这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从字缝里却可以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篇小说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图画：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鲜血淋漓的“吃人”的关系，不是什么表面上说得好听的“仁义道德”。而这个“吃人”的关系，到处普遍地存在着，不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同样，就是在封建社会里的封建家庭中也是存在着的。封建统治者可以从旧的礼教制度

中找出堂皇的理由，作为他们吃人的“理论”根据，“易子而食”，“食肉寝皮”，那是古已有之的惯例，不能算作一种罪恶，而是一件平平常常的，甚至于应该有的事情。就是这一班吃人的人，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吃，不敢直接下手，总是鬼崇崇地想法子来遮掩他们的丑态；因为直接下手，怕有祸祟，于是大家连络起来，布满了罗网，逼着被吃者自杀，这样，他们既没有杀人的罪名，又达到了目的，偿了心愿。在这样吃人的人们中间，他们自己也不是平安无事的，他们彼此互相戒备，自己想去吃人，却又怕被别人吃掉，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而他们却又至死也不肯去掉这吃人的心思。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声遮掩”的人肉筵席，在中国已经摆得很久了，“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鲁迅用他的伟大的讽刺的画笔第一次给它勾出了一个鲜明的轮廓。

作者借着“狂人”的嘴责问道：

“吃人的事，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不，……”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想含糊过去。

“不对？为何要吃？”

“没有的事，……”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想抵赖过去。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在还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封建制度维护者理屈词穷了。

“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一个从来如此”，正是《狂人日记》的作者所要反对的。

这是一幅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及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才是他创作生活的真正开始，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鲁迅建立了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传统，并奠定了它的最初的基石。在这篇小说里，鲁迅用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概括的手法，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他通过对于“狂人”的描写，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痛恨。同时，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这种思想武器、文艺武器。不可否认，在这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也充满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气息。这样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是一切伟大的作

家的共同特色。一方面，鲁迅受俄罗斯的伟大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浪漫主义情调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篇作品里，鲁迅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结合得更密切，理想更明确，这是他的特色。

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不同，鲁迅的生活，思想有了一种新的发展。若说以前是准备工作、酝酿工作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鲁迅的生活和思想就要开出丰富多彩的花了，时代的条件已经具备，他可以真正实现他那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宿愿了。同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随感，这便是鲁迅最初的杂文，这样，鲁迅又使用了另一个武器，并成为他终生的战斗武器。鲁迅认为更及时的、更迫切的需要的，更能发挥战斗作用的武器，就是那在黑暗中时时闪烁着战斗光芒的匕首式的杂文。

杂文这一种文体，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广泛地采用着，特别是用它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这首先是由鲁迅开始的；并且也是因为有了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它才在很短的期间，达到辉煌的艺术成就。正如鲁迅所说：这种文体，在美国式的《文学概论》里是查不到的。他写作这些杂文时，也没有打算把它放进什么“艺术之宫”或学术殿堂里去。随感随写，不拘形式，针对敌人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决不无的放矢，虚耗实力。

鲁迅的小说或杂文，毫不掩蔽自己作品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目的，并称“遵命文学”。不过，他不遵奉皇上的圣旨，而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命令。而这革命先驱者所组成的团体是《新青年》杂志社，其伟大代表者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以初期马克思主义政论家的资格登场，在文学方面，则要以鲁迅的功绩为第一，但是，他们的共同战斗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1917年的11月7日开始，旧世界改变了他本来的面貌。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空前的根本变化——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它不仅使帝国主义国家在他们的本国里的统治基础动摇了，它还使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动摇。被压迫的东方在被帝国主义所包围的茫茫大海里，望见了自已的解放的曙光。在十月革命鼓舞下，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行动起来了。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革命的爱国主义者鲁迅，立刻就参加了这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行列，向着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国际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军，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人民迫切地需要像鲁迅这样的勇敢而坚决的战士，而这样的战士也正寻求人民给予他的支持。

鲁迅参加了文化革命的工作，参加了领导当时革命运动和文化思想运动的指导刊物《新青年》杂志的

编辑工作。他不但为这个刊物写稿，曾有一个时期，还经常出席它的编辑会议。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等作品，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的真面目，以引起人们的憎恨和警惕。

鲁迅描写了一个旧时代没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孔乙己。他是一个一辈子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依靠替人家抄书为生的“书生”。他身着又脏又破的长衫，站在咸亨酒店曲尺形的柜台外面喝酒。他好吃懒做，在人家抄书时，不几天，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这样几次，就没有人叫他抄书了。他没有办法，就不免偶然做一些偷窃的事。一次，在丁举人的家里偷东西，被抓住了，写了服辩，又捆打了大半夜，打断了腿。以后，他只好盘着打折的腿，下面垫一个薄团，用草绳挂在肩上，用手行走了。

有一天，他爬到咸亨酒店来喝酒，遭到了人们的奚落和嘲笑。

“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掌柜笑着对他说。

“不要取笑。”

“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

“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凄厉，想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后来，确是没有人再提起他来，只是在第二年的

端午节，掌柜想起了他还欠十九个钱的酒债。

孔乙己终于在奚落和嘲笑中死去了，这就是孔乙己一生简略的梗概。

在半封建社会，1912年之前，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临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爬上去，像丁举人之流，可随心所欲，作威作福；一条是跌下来，像孔乙己这样，被人当作嘲笑的材料。“丁举人”是吃人的，“孔乙己”是被吃的。孔乙己的人生，似乎是专供别人奚落和取笑的。像孔乙己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完全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当然也不可能和人民取得联系。所以他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作者既对这位“小人物”给予了同情，但同时，又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孔乙己的命运是可悲的，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作者也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及可笑。通过鲁迅天才的艺术概括，使我们对于旧时代、旧社会、旧制度更加憎恨。孔乙己，这个艺术形象，他那愁苦的夹杂着伤痕的面容，会不时出现在我们面前。

与《孔乙己》相比，《药》写的是另一个主题。

这篇小说的背景是辛亥革命，通过在华老栓家茶铺里的一段对话，为读者展示了革命者夏瑜的形象。通过简短的对话，读者可以想到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气概。只可惜，他牺牲后，被群众用他的血作药治病！

这篇小说，一方面作者表明了人民尚未觉醒；另一方面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革命没有紧密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对英雄人物——夏瑜，是怀着极大敬意的；而对于辛亥革命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是，鲁迅对于革命，并未失去信心和希望，他认为，人民终于是要觉醒的，他们将踏着先驱的血迹前进。

鲁迅的作品在内容上是深刻的，在形式上也是完美的，因此打动了一些青年读者的心。紧跟鲁迅之后起来了成批的新文学作品，他们大部分团结在《新青年》和其他新创刊的进步杂志周围，形成了一支新的文化队伍。他们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迅速扩展到广大的社会各阶层里面去。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潮一旦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更巨大的也更深刻的影响。当中国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扭转了它的方向。当文艺是为着革命政治、革命阶级服务的时刻，它就获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之，它也就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当一个作家和革命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取得了联系，并自觉地为着革命的、进步的事业服务的时候，他的创作才能也就得到了发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全人类历史的

新时代，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了和鼓舞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照耀之下，在一个完全新的意义上，鲁迅又重新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活动。

1919年8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买了一所房子，结束了会馆生活。并把母亲和家里人接到了北京，此后他们就和周作人一家人在北京定居下来了。

如鲁迅在《故乡》里所描写的，他这次回故乡接母亲及家里人，所看到的景象大致上一样。现在故乡已失去了他想象中幼年时代的模样，凄凉、苍黄的天底下，没有一点活气。鲁迅的母亲特地托人带了口信到乡下，叫了与鲁迅幼年时代一起玩耍的天真活泼的闰土。但是，闰土也变了，沉重的生活重担，使鲁迅看不出一点幼年时代的闰土了。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添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在海边种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和一枝长烟管，那手也不是记忆中的红活圆实的手，它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苛税、饥荒、多子、疾病、兵、匪、

官、绅，把闰土折磨得简直像一个木偶人了。这便是鲁迅在《故乡》中所描写的闰土的形象。

这次离开故乡，鲁迅的心情很沉重，想起他和闰土幼年的生活时，他有些惘然。

“我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在小说结尾处，鲁迅写道：“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便是鲁迅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

鲁迅在北京八道湾 11 号定居下来后，一面仍在教育部任职，一面继续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在 1920 年的 6 月，写成了短篇小说《明天》；七月又写成短篇小说《一件小事》。

《明天》和《药》在艺术风格上有些相似，在这篇小说里，“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是，作者也未把那种悲惨渲染得十分厉害，并没有过分地去描写单四嫂子失去儿子的悲哀，却用更多的笔

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读了这篇小说，人们自然都要给予单四嫂子以深切的同情，而对于庸医何小仙，流氓蓝皮阿五之流则产生了极大的憎恨。但追根究底，如果去寻求造成单四嫂子的不幸原因，这就不能把某一种罪恶的行为简单地归之于个人，而必须谴责那产生这一种罪恶的社会了。

《一件小事》完全是另一种写法。

从这篇小说看来，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颇有一些相似的。但是，如果从内容上来考察，就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来说，鲁迅似乎是更为明确的；鲁迅的现实主义和他以前的古典作家比起来，也似乎是更有目的，更有理想的。

作者写这篇小说，选用了第一人称，通过充满着激情的“我”来表示自己对于上流社会，对于知识分子，以及对于劳动人民的各不相同的态度。在整篇小说里，抒情的气氛是很浓的；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这篇小说中的所谓“我”，当然不能看作是作者自己；但是，在这个“我”中，不可否认，也可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内。作者选用第一人称，显然是为了更便于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作者对于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朽是蔑视的。当时的“耳闻目睹所谓国家大事”，这一切“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

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是“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不能忘怀”——那就是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关于人力车夫的事迹。作者把这位人力车夫搀扶跌倒的老妇去到警察分驻所的正直的行为，和不相信劳动者，轻视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观望与怀疑对比之后，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身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作者十分激动，他满怀着热情，对于劳动人民，他表示出崇高的敬意，他写道：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功，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渐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920年的秋季，鲁迅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中国小说史》，从此鲁迅不但以他的文章和广大读者接触，他本人也走到青年学生群中来了。

每逢星期二上午，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和广大青年见面的时候，鲁迅都要受到热烈的欢迎。

教室里和教室外都挤满了学生，这里包括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旁听的。他讲《中国小说史》，虽然事前印发了讲义，而他却不是简单地照念，而是按着讲义的论点，加以发挥。他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旧布长袍，不常修理的头发下面露出方正的前额，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向下陷，眼角也微向下垂，浓密的短须掩着他的上唇，这一切都令人看不出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他说的是带有绍兴方言音色的普通话，声音安详有力，手势、表情也都是那么平静，可是，教室里却不时爆发出笑声。他把那蒙着历史灰尘的古代人物，通过每一件具体事实，显示给听者，他不单是讲解《中国小说史》，而且是在解剖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鲁迅讲授完《中国小说史》后，又讲了一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日子里，鲁迅和青年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0年10月，鲁迅又写了两个短篇：《头发的故事》和《风波》。

《头发的故事》的主题中心思想是在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作者通过小说中那位N先生的意见，评价了辛亥革命，同时也讽刺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而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失望，他的痛苦也是很深的。

在这篇小说里的 N 先生对于往事的追怀，他的悲愤，他的感慨，他的惋惜，……即所谓“精神上的丝缕”，不是没有联系的。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一开头，便曾写道：

“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记，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风波》里面所描写的历史背景是 1917 年的张勋复辟事件。作者借着张勋复辟这件事在当时农村中所引起的风波，揭露了黑暗反动势力蠢蠢欲动的姿态。但是，张勋复辟很快就失败了，皇帝并没有坐龙庭。这是一篇在艺术形式上非常完整的短篇小说，作者用简洁、明快的手法，不但描绘出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刻画出了淳朴的农民的性格：善良、忠厚，使人们发生了无限的同情，但是，他们还没有觉醒起来，暂时仍处在黑暗反动势力欺凌和压迫之下，却又是令人愤慨和惋惜的。

接着这两篇小说之后，鲁迅又创作了短篇小说《故乡》。

作者用回忆的抒情的笔调，写下了半封建半殖民

地农村景象，和农民的生活命运。鲁迅描写了那永远令人难忘的农民的闰土形象，闰土的命运就是当时千百万农民的共同命运。在这篇充满了抒情意味的小说中，作者表达了生活在困苦中的农民的愿望，实际上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愿望。这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作者从现实情况出发，来描写生活和刻画农民的逼真的形象，令人读来栩栩如生。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一天天高涨。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起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凶猛的反攻，而且逐渐地凶恶起来。鲁迅率领着文化战线上的一群青年战士，和敌人展开了尖锐的激烈的斗争。

文化战线上的一切反动派，也和他们的政治上的主人一样，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的维护者，是他们的代言人。虽然他们都自打着不同的旗号。但他们的实质上是反人民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死敌。

其中复古主义的“国粹派”，他们是顽固的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大家都来做旧制度的奴隶。他们认为，凡是古代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是洪水猛兽，必须加以排斥。他们教育青年说，一切已经死去的腐朽的教条是祖传的精华和宝贝，是“国粹”。

鲁迅首先起来驳斥了他们的这种谬论。他指出：“国粹”就是这些先生们认为的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也就是一些特别的东西。鲁迅用“脸上的瘤”，来形容他们所说的“国粹”，“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他又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与“国粹主义”如出一辙的反动顽固派是“二重思想”鼓吹者。他们看到单靠“国粹”是不能挽救封建统治阶级的灭亡的，想必须加上点洋玩意，方可苟延残喘。但外来的势力太大了，既无力量抵抗，又不肯完全接受，于是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终究走回了过去的老路。

鲁迅严厉地批判这种“二重思想”：“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讥讽道：“世界虽然不小，但徬徨的人种，是终究寻不出位置的。”

“国粹主义”和“二重思想”使当时的社会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地出现“哲学算命”、“科学扶乩”

等怪现象。这一切，都是当时鲁迅杂文里所攻击的现象。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来，鲁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在这古老的腐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他们才是这一片荒凉的废墟上唯一的新生幼芽。因为鲁迅十分确信将来总是会比现在好的，青年人总是胜过老年人的。让老的让开道，让新的欢天喜地走向壮阔的路，让新的替代旧的。后来的人超越自己的祖先，一代一代产生新的人，新的社会——虽然当时鲁迅还不能够确定它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总是要到来的，目前的暂时的黑暗是无足悲的。

在鲁迅的杂文里，坚决地反对封建家族制度、买卖式的包办婚姻制度，提倡新式的合理的家庭关系，婚姻恋爱自由；反迷信，倡科学；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

把自己说成是一种“不偏不激”的最“公正”的人物的是“学衡派”，他们实际上也是反对新文化的。他们主张旧文学，反对新文学，可是他们自己所作的旧体诗文中，却连字句、题目都不通。鲁迅讥道：“倘使文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比起“同粹派”来，他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不用“衡”，只要“估”一

下就知道半斤八两了。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里的基本内容，都是对上述这一切的攻击。

鲁迅还有一个敌人，即胡适。

胡适其人在他还未公开地从新文化运动阵营分裂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反对新文化运动了。他认为《新青年》杂志是“苏联俄罗斯的汉译本，并打算将其停刊，而另创一个专谈学术的杂志，并以“分裂”来威胁当时《新青年》杂志的同人。这事遭到了李大钊和鲁迅的反对。这个阴谋未得逞，于是他在他所主持的《努力周报》上提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口号。他在“整理国故”的旗子底下，贩卖实验主义哲学。于是胡适就从新文化阵营中分化出去，立刻站到了人民敌人的位置上，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起来，妄想抵制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引诱人们离开实际的政治斗争；无视军阀的祸国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而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论”和“好政府主义”。实际上他惧怕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他企图通过引导青年离开现实斗争，来达到他卑劣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胡适的一种欺骗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立刻驳斥了他，率先提出了反对意见。李大钊认为，“主义”和“问题”是不能

分开的。从事社会活动的革命家，他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宣传主义。当前，从事社会运动的革命家，要为革命民主主义而斗争，去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将来，要为社会主义奋斗，去消灭资本主义势力。鲁迅和李大钊站在一起，给予胡适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以有力的打击。在广大青年群众面前，鲁迅揭穿了胡适引诱青年离开实际的社会斗争的阴险目的，说不斗争的“书”，不读也可以，要“行”——行动起来，和旧社会作坚决的斗争。

胡适被中国人民改造旧世界的坚决行动所吓倒。他又从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哲学里乞求灵药，来抵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竭力宣扬美国人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叫人永远安于奴隶的地位。

胡适所贩卖的骗人的哲学，目的是诱惑群众放弃革命行动和阶级斗争，企图把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利益调和起来，实质上就是要叫革命人民向反动势力去投降这个骗局，是完全暴露出来了。从此时起，鲁迅站在捍卫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和胡适这一派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持久不懈的韧性的斗争，——虽然，他们的姓名不一定都叫“胡适”，而是叫做“梁实秋”或是“陈西滢”；他们的旗帜也不一定是“实验主义”，而是什么“人性论”之类的东西。

鲁迅在1921年写作《故乡》之后，又在同年写下了他的不朽的《阿Q正传》；在这篇著名的作品里，作者深刻地刻画了农村中贫苦雇农阿Q的形象，通过阿Q这一个艺术形象，又批判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以及产生这个阿Q和阿Q的自欺欺人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阿Q这个形象在鲁迅的心中，确乎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只是没有机会把他写出来。这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就请鲁迅写文章。于是，鲁迅就写了第一章：序。第一章登出之后，以后每七天必须写一点。那时，鲁迅的工作虽然并不十分忙，可是生活颇不安定，夜间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很难静坐一会，思考一下。孙伏园又是一位非常善于催稿的人，每星期必到鲁迅这里来，来时，就笑嘻嘻地对鲁迅说道：“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鲁迅只得写下去，于是又一章。后来，鲁迅渐渐认真写起来了，编者也觉得不很“开心”，于是从第二章起，就把它移在《新青年》栏里。这样大约继续有两个多月；鲁迅实在很想把这故事结束，然而编者不赞成，假如一结束，他也许要抗议；直到后来，孙伏园因事到别处去了一趟，代替他的是另一位编辑，对于阿Q素无爱憎，鲁迅把“大团圆”送去，他就照登出来。

等到孙伏园回来，阿 Q 已经被“枪毙”有一个多月了。再也无法复活。

住在未庄土谷祠里的阿 Q，他失掉自己的土地，也就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凭依，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有时工作略长，他也能住在临时的主人家里，但工作一完就要离开。只要在忙碌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他。一到空闲，就把他忘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就是“阿 Q 真能做！”阿 Q 虽然完全破产，但他却妄自尊大，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失败之后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也曾想参加革命，但革命被出卖了，赵太爷，“假洋鬼子”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反过来却不准他革命。当未庄的封建统治阶级确实掌握了统治权，他就在莫名其妙的罪名下被枪毙了。——这就是阿 Q 简略的一生。

当《阿 Q 正传》在《晨报副刊》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当时一些上层社会中的“正人君子”、“绅士淑女”、小政客、小官僚……等的恐惧和不安，恐怕它要“骂”到自己的头上。最后，当这篇文章被明明白白地收在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呐喊》里面，他们才恍然大悟。其实，鲁迅并没有骂谁和谁，他所谴责的是整个旧社会，他所讽刺的也不是某一个人。他虽

说是为阿 Q 作“正传”，但是要画出来的却是“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要写出“在他眼里所经过的旧中国的人生”。他所描绘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变革的巨大画幅，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农民的悲惨的命运。

远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一年，鲁迅还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家里，忽听到从西面隔壁梁家台门的墙缺口地方，爬过一个人来。他急忙打开窗一看，原来是流浪汉——阿桂。因为生活没有着落，阿桂变成了小偷。辛亥革命爆发了，杭州先光复，绍兴也正在酝酿起义的时候，阿桂曾一度活跃过，在大街上，他大声嚷：“我们的时候到了！到明天，房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他的这种举动，曾使得当时的绅士们大为吃惊，但不久，这事也就成为过去了。这一个阿桂可能就是在鲁迅心中酝酿着的最初的阿 Q 这个艺术形象极原始的模式。但是，鲁迅创作“不用一个一定的人”，而是“杂取种种人”，“凑合起来的”。这一个被描写进《阿 Q 正传》中的阿 Q 典型，当然，还包括另外一批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他们的精神状况里的某些特点也被概括在内。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就创造了阿 Q 这一个复杂的典型。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谱写了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色彩。作者通过对于阿 Q 的描写，对于农民的命运和

前途，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另外，当前革命的敌人加在人民头上的压迫，特别是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则是异常沉重的。这也是作者所深切理解的。鲁迅不仅为他们的经济生活上的沉重负担而悲愤，更为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这些不是雇农阿Q所单独具有的，而是“沉默的国民魂灵”深处最落后的东西——失败主义的“精神胜利法”。

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在《阿Q正传》里，通过阿Q这个形象，进行了两方面的批判：对于人民自己身上所存在着的落后的缺点，特别是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无限的痛心，提出深刻的永远值得警惕的批判，他指出，必须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彻底清除最有害的失败主义，和它的影响，从而走向解放斗争的道路；对于人民的敌人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怀着无比的憎恨，予以严厉的挞伐，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加在被压迫人民身上的思想毒害，则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这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通过对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描写，作者深刻地反映出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在几千年封建势力和近百年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过着屈辱的麻木的生活。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在当时，作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必须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揭出痛苦”，为的是“引

起疗救的注意”。它的启发是深刻的。在年轻的中国新文学的领域里，《阿Q正传》的发表，是一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事情。它不仅更进一步地显示出了新文学的成绩，成为新文学中的丰碑，为现代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同时，在世界文学领域里，也跨出了辉煌的一步。《阿Q正传》发表之后不久，它立刻就被译成了好几国文字。它在全世界的读者中间传播，并立刻得到国际上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家的赞扬，获得了国际名声。伟大作家鲁迅用他的《阿Q正传》以及他的一系列的不朽的文学创作，把中国的革命的新文学和世界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连接起来了。鲁迅不仅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个作家，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他也成为20世纪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1922年春，在鲁迅的八道湾寓居，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他不仅是一个世界语学者、音乐家、同时又是一个童话作家。他在1921年年底来到中国，这之前，他在印度、缅甸、日本各地漫游。在1921年，他曾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但不久就被驱逐出境了。日本的军警机关认为他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对他进行了各种虐待和殴打而后下令把他驱逐了。

爱罗先珂离开日本后先到上海，后又来到北京。

鲁迅以他的亲切关怀接待了这位远道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客人。他时常陪着盲诗人在院子里散步和谈天，对他的寂寞表示了十分的同情。爱罗先珂在鲁迅家里住到了夏天，才回到了故乡乌克兰。鲁迅在和他相处的一些日子里，翻译出了他的多篇童话创作：《狭的笼》、《池边》、《鵑的心》、《春夜的梦》……等，后都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里面。

这之后，鲁迅便把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屋让给周作人一家居住，自己在1923年的8月搬出了八道湾。先是暂住在砖塔胡同61号一个同乡熟人的家里，后又搬入西三条胡同21号的寓居。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房子，是鲁迅向朋友借钱买下的，经过翻新，在1924年5月搬了进去。这里，便变成了当时北京青年们，特别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们的一个活动中心。

自从鲁迅住到这里后，来他这里的青年们一天比一天多，给这条本是寂寞、荒凉的“陋巷”增加了许多生气。青年们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来叩鲁迅的家门，他们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里一样。

鲁迅的工作经常繁忙。大约每天总要接待青年们到十一二点钟，然后他就开始工作。如果没有急迫的事，就稍休息一下，看看书，2时左右才入睡。他经常工作得很晚，有时甚至天亮了，才放下手中的笔。

他的不少小说，大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在院子里种着几棵丁香花，白的和紫的，三两株枣树高出于屋檐之上。在不大的三间北屋后面又接出去一间，人们叫它做“老虎尾巴”的“斗室”，这就是鲁迅工作、休息和接待学生的地方。透过这间“斗室”后墙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沿着后墙的墙角，种着几株青扬和几簇榆叶梅。室内的玻璃窗下，是一张单人的木板床，东壁下，贴墙放着一张写字台，台子旁边是一张带扶手的藤椅。西壁下，放着一张茶几和两张木椅。这个小屋最多不能超过五个人，否则便坐不下了。

鲁迅在这里和青年们谈天是他所需要的，否则他也许会感到寂寞。他们的谈话无拘无束，鲁迅的语言也是那么简洁和朴素。由于鲁迅谈话时总吸烟，所以屋里充满了浓厚的香烟味。他恐怕有些青年们不习惯，便笑着走去把窗子打开。鲁迅和青年们谈天，对于他就是一种休息，他还经常劝青年们多留一会，只要客人有时间，在他是无妨的。

在这里，鲁迅经常替青年们进行批稿、审稿、校对的工作。他对于青年们的请求决不推辞，非常爽快地答应。他还经常接受青年作家的委托，替他们编选集、编目录、写序言，甚至做设计、封面设计等。青

年们从鲁迅这里所得的帮助，总是具体的、无私的、无微不至的，可以说他们也确实需要鲁迅！

鲁迅对于青年们的爱是深厚的，是无私的。

1923年，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了。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创作外，还包括《端午节》、《白光》、《兔和猫》、《社戏》等几个短篇。《呐喊》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立刻引起了当时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立刻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对于这书的出版，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批评家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里，首先着重指出《呐喊》的时代的意义，他写道：

“近半年来的文坛，可谓消极到极处了。我忍着声音等待震破这沉默的音响的到来，终于听到了一声宏亮的呐喊。在我未曾直接耳闻这一声宏亮的呐喊之先，我先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呐喊的呼声，这种呼声对于提醒人们迟钝的注意力是必要的，然而于我这种吞声等着的人，却有点觉得嘈杂而可厌。……然而我终于听到了一声宏亮的呐喊了。这便是鲁迅的‘呐喊’，这一部小说集。

《呐喊》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学对于旧文学斗争的胜利。它把那一些文坛上的陈腐的劳什事一扫而光，推翻了旧文学曾经取得的优势，树立了新文学的战斗

的旗帜。茅盾在《读 呐喊 》一文里，热烈地赞扬道：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克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勇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然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而然未到的形式，即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的几句话，我们在《呐喊》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之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

而资产阶级的评论家所采取的却是另一种态度。他们对于《呐喊》的出版，则表示十分冷淡；或者加以歪曲的解释。当时，在《现代评论》上，曾发表过一篇张定璜的题为《鲁迅先生》的文章，他写道：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他把鲁迅解释为生活的旁观者。他认为：鲁迅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那就是，忠于他的表现的，忠于他自己的艺术家。”

很显然，他曲解鲁迅为一个旁观者。但是，无数事实证明，鲁迅从他的革命文学活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以战士姿态出现的。他的革命文学作品——不论是杂文或者小说——都是他作战的武器，并以他的战斗的革命文学作品，建立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的、战斗的传统。首先，鲁迅把他的文学作品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他把文学事业和改造社会的革命事业密切结合起来。其次，在艺术风格上，作者以简洁，明快的手法，在文章中体现了彻底的革命的批判精神。再次，在创作方法上，毋庸置疑，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特色表现得最为充分。同时，和他的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并存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

鲁迅的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是在1924年的6月，这书是根据他几年来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所编的讲义修改而成。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小说发展史中，这本书是一个创举。作者不但挖掘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宝藏，同时，也揭露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的一些奥秘，表现出了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在这本书里，有许

多地方的论断，达到了令人信服的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思想高度。

《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对于中国封建阶级一向把小说看做“闲书”的封建主义的文学观点，和中国资产阶级竭力贬低自己民族文化遗产，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传统的观点，予以有力的打击。它证明了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是异常丰富的，历史是悠久的。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研究者和继承者的鲁迅，他第一个确定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应有的地位。

鲁迅非常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尤其对于像嵇康那样的坚毅不屈的文学家，他在阴险的封建统治者的监视下，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见解，不随声附和的坚持正义的精神使得鲁迅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鲁迅对于嵇康的作品，包括了他的全部诗文的“嵇康集”的校勘，下过很大的功夫。经过他不断的校勘，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嵇康集》，没有比这再好的版本了。

对于唐代的文化，鲁迅也是特别爱好的。1924年7月，鲁迅答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的邀请，到西安去讲学一次，所讲的仍是小说史。并到当地——唐代京城长安，体味它的风光来准备以唐明皇和杨贵

妃的恋爱故事做线索，以当时的唐代历史和文化做背景，来写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但在西安并没有逗留到预定的日期，在七月底，鲁迅当小说史讲授到一段落，就提前回北京了。

《晨报副刊》的编者孙伏园，由于一件事，他愤然辞职，准备自办刊物，并得到了鲁迅的赞成和竭力赞助。

原来，在1924年前后的北京报纸和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荒凉的景象，失恋诗风行一时。对于这些，鲁迅早以厌烦，于是就故意作了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题作《我的失恋》的“新打油诗”，又故意用了“某生者”笔名投到《晨报副刊》上，来和当时的“诗人”们开开玩笑。孙伏园很熟悉鲁迅的字体和笔迹，所以他一看，就知道是鲁迅用“某生者”的笔名投来的稿子，于是他便立刻拿去付排了。恰巧，这时一位新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他和晨报馆的关系很深，并对《副刊》颇不满意，决议对《副刊》加以“改革”。这时，他看到了鲁迅以“某生者”笔名写的《我的失恋》这首打油诗，于是他就以“不成东西”为理由，未经编者同意，就把稿子抽掉，于是事情闹开，才有了孙伏园辞职自办刊物的事情。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出版了，每周出版一次，撰稿人最初是16位，都是孙伏园邀请

来的。由于各种原因，到了后来，《语丝》的固定投稿者，至多只剩了五六个人，其中最勤快的就是鲁迅。从最初的发刊起，几乎是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收集在《野草》里的散文诗，就全部都是在《语丝》上发表过的；此外，还有后来收集在短篇小说集《彷徨》内的《高老夫子》和《离婚》，和收集在杂文集《坟》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睁了眼看》、《说胡须》……等许多杂文、短评，以及其他的创作和翻译，也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鲁迅成为这个刊物实际上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语丝》的创办者，自跑印刷厂，自当校对，自折报纸，自己拿到大众聚集的场所去兜售。由于他们的努力，使这份原本影响不大的刊物，逐渐风行起来，销路一天比一天好。以这刊物为中心，在鲁迅的影响下，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

1925年4月，鲁迅又帮助了另一些青年成立了莽原社。这些青年大都是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对于现状都是很不满的。鲁迅很早就希望一些青年站出来，对于旧中国的旧社会、旧文明，加以毫无忌惮的批评。这些就是成立莽原社的目的。莽原社最主要的活动是出版《莽原》这个刊物。它最初是借用北京《京报》副刊的地位，并随着《京报》发行，开

始是周刊。后来又改为独立出版的半月刊。《莽原》的篇幅虽然不多，但却费去了鲁迅的不少心血。重要的批评论文由他写；青年们写的稿子也要由他亲自来查看；排版的格式如何，怎样装订，为了使这小小的刊物美观，甚至于一个标点的位置，他都放在心里。为了支持这个刊物，鲁迅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战斗。鲁迅在《语丝》上已经发现和培养了一些青年作家，现在他又继续在《莽原》上竭力推荐一批新的作家和翻译家。

继莽原社成立之后，在1925年，鲁迅又帮助了另外一批青年们成立了未名社。它和莽原社不同的是，更加着重于文学创作和翻译介绍方面的工作。鲁迅还帮助青年作家编辑和出版了两种丛书：一种是专收文学创作的《乌合丛书》，另一种是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丛刊》。鲁迅自己的著名创作，短篇小说集《呐喊》，就是收入《乌合丛书》里的一种。鲁迅的作品和青年作家的一些作品并列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对于青年作家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通过他们的劳动，更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苏联的革命文学理论，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开始更广泛地在中国读者中间流行起来，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谊的“中俄文字之交”，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自从《新青年》这个团体散掉了之后，原来参加

了这团体的人们起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最后剩下来的，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了，鲁迅便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

这一次，鲁迅“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曾经使他感到很失望。他后来在一首《题彷徨》的小诗里，描写当时的心情说：

寂寞新文苑，平安回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戈独彷徨。

鲁迅对这种生活十分不满意，他怀着迫切的心情，再去寻求并肩作战的伙伴，继续和旧社会进行斗争。寻求的结果是，他在青年群众中找到了支持他的战斗力量，即便如此，他那彷徨和苦闷的心情却没有减轻，反而更加苦闷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情绪，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和短篇小说集《彷徨》中也有表现。

《野草》写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彷徨》写于1924年1月到1925年11月。在《野草》中，作者当时思想上的矛盾，是采取抒情的散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它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在朦胧中，有许多美好的人和事，“错踪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

开去，以至于无穷。”鲁迅也描绘了他的空虚。在那曾经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心里，忽而感到了空虚；而在这空虚中却又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总之，鲁迅当时的思想情绪中是充满矛盾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大有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而他这种思想上存有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明确他的出路在哪儿，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

《彷徨》这部作品，鲁迅是以极沉重的心情写出来的。例如他的《祝福》和《伤逝》。

祥林嫂是《祝福》里的女主人公，她的命运是悲惨的。她孤立无援，深深地陷在封建社会的罗网之中。她在第二次结婚之后，“似乎交了好运了”，但不久，不幸的事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伤寒病夺去了丈夫，狼吃掉了她的孩子阿毛，在她的心上便永远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痛。她把她的痛苦编成了一个故事：“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

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子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这个凄惨的故事，起初也会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同情，但到后来，不料竟成为人们的笑柄。“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她感到了悲哀和孤独。然而，可悲的还不在这里。可悲的是她的再嫁，“落了一件大罪名”，“将来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阎罗大王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当她听到这话时，她脸上立刻便冒出恐怖的神色来，她千方百计地设法，把自己血汗的积蓄送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这一批的罪名。可是，当她的这一个赎罪的希望破灭了，她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但是，对于祥林嫂，作者也并未完全绝望，她并没有把这—个可尊敬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遭受到重重压迫和蹂躏的妇女，描写成为仅仅是一个消极的人物。在她的生命即将毁灭的一刹那，她对于那代表着封建、迷信的权威——阎罗大王也发生了怀疑。她怀疑那地狱是否存在？灵魂是否存在？这样的发自最受压迫的妇女祥林嫂内心深处的声音是动人心魄的！

在写作《伤逝》时，作者的心情又复是沉重的。对于涓生与子君，作者抱着批判的态度，而在批判中也分明流露出一些同情。他们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激荡而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理想，有希望，也曾有过一些微弱的反抗；他们不满意现状，“谈专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勃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特别是子君，这个中国的“娜拉”，当她的封建家庭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时，她竟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当时是有它的很大的进步意义的。她的那种蔑视旧社会对于恋爱自由的歧视，蔑视那一些谈笑和猥亵的眼光的精神，她“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无畏的精神，以及为了爱情不惜和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都是令人尊敬的。可惜的是，她和涓生的爱情是缺乏坚实的基础的。作

者借着涓生的嘴批判道：“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里所说的“全盘疏忽了”“别的人生要义”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婚后不久，子君就失去了她先前的勇气，更是在生活的压迫之下，这位从家庭中出走的“娜拉”，又不得不回到她的“烈日一般的严威”的父亲那里去，她“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出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样可怕的事啊！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这样的结局是脱离现实斗争、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的悲惨的结局。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对于涓生和子君虽然充满着同情，笔端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但是，同时却并未失去对于他们的批判。

从整个的情况看来，在《彷徨》中所流露出来的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作者的思想情绪并不是完全低沉下去的，这中间也有着高低和起伏。他在这部小说集的扉页上，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以表达自己的心情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可以肯定：鲁迅思想上的这种波动，只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暂时的现象，而不是他的思想中的主流方面。如果我们把鲁迅的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部分：小

说和杂文，联系起来看，那么就不难理解。在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中，坚强不屈的战斗仍是它的主要的方面。

《呐喊》和《彷徨》虽然是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有着一些差别；但是，它们也有某些共同的地方。鲁迅的创作的背景，不论是在《呐喊》或《彷徨》中，他所描写的最常见的典型环境大约总离不开他的故乡绍兴农村的环境；他所描写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也大都在这样的环境里发生的。在自然景色方面，大抵也是如此。在这两本书中的许多描写细节的地方，大体也都是绍兴或是绍兴附近的农村人民的生活风尚和习俗。总之，他所最熟悉的绍兴农村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在《呐喊》和《彷徨》中，也有其一致的地方。贯穿着这两本书的中心思想，如作者在谈到自己作品时屡次表明的，是在于“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作者以锐利的讽刺的笔锋，刺破了“上流社会”的腐朽的黑暗，描绘出了“上流社会”中人物的丑恶的嘴脸和灵魂，他们的卑劣和无耻，一句话，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堕落”。而对于“下层社会”中人们的“不幸”，作者则怀着深切的同情。鲁迅把现实生活中的两种敌对的社会力量，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纠缠和斗争，表现得

十分鲜明。他把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描写得淋漓尽致，把他们的虚伪的面目揭露无遗，这就更加强了艺术效果，唤醒人们对于一些丑恶的东西的鄙弃和憎恶。

这两本书在客观上，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直到1924——1927年大革命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封建阶级的没落和农民的革命情绪的增长。

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的真正开始的时期，已是在新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已经觉醒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且生根、开花、结果。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1921年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站在民族的和阶级的斗争最前线，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贡献出自己全部力量。当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结成了联盟，找到了工人阶级这样的领导者的时候，他们就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就将改变他们的历史的命运。党领导着整个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前进。当然，党也领导着中国人民的新的文化革命事业前进。“五四”以来的鲁迅的革命的文学活动，就是遵循着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的方向进行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知识界发生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代表胡适、陈西滢之流的人物，日益显露出了他们的充当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官僚的走狗的真面目。鲁迅便率领着一支年青的文化新军和他们这一班御用的走狗文人，展开激烈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

女师大原来是一所由初级师范改成女子高等师范的学校。它的校长原是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许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从北京大学请得许多教师来女师大兼课，鲁迅也是其中之一。许校长辛苦经营，使学校有了一番新气象，这正惹起了代表封建势力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爪牙的嫉恶，反动当局对许校长制造了许多流言，以致使他愤而辞职，接替的是由教育总长派来的杨荫榆女士。这位女校长和反动教育当局勾结起来，排除异己，极力压迫学生，为了中饱私囊，她又违反章程，向学生们征收额外的费用。这种种劣行，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于是就起来反对她做校长。由于有章士钊的背后支持，她有恃无恐，一面在学校外奔走活动，一面在校内布置爪牙。当她这些都准备布置就绪后，就向学生们下手了。

1925年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北京学生界召开纪念大会。杨荫榆就借此机会在校内布置了一个讲演会，邀请了校内校外的人士前来演讲，并以校长资格出面主持。这是一个阴谋：她想利用这个机

会，把学潮平息下去。如果有学生反对她，她就以不守秩序为名，给予严厉惩罚；如果没有学生反对，那就是说，默认她继续当校长。这天早晨，当杨荫榆陪着讲演者进入会场时，学生们就迎上去，劝她不要出席。但是，她未听从劝告，混进了会场。于是，她在会场的一片嘘声中，没趣地走开了。这时，她事先布置好的一位教员讲话说，学生们在“国耻纪念日”是不应该捣乱的，因此大约要有几个人将会遭到开除学籍的处分；不过，事情还不是完全没有挽回余地的。他的意思是在暗示，学生们应该趁此向杨荫榆妥协让步，否则，她就要用开除学籍的手段来对付学生了。他的这一番讲话，不打自招地把杨荫榆的阴谋暴露出来了。这个威胁自然是吓不倒学生的，学生们干脆地拒绝了他。

杨荫榆因为有北洋军阀政府教育当局的支持，她既定的阴谋正一步步开始进行着。第二天，学校公布了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代表被开除。全校的学生都被激怒了，她们立刻到操场上集合，整队走向校长办公室，抗议杨荫榆开除学生的无理措施。全体学生都一致表示拥护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和她们的总干事许广平，并且支持着她拿封条把校长办公室封掉。斗争从此更尖锐化了。杨荫榆的阴谋虽然并未得逞，但整个的学校却被迫陷于停顿状态。求学心切的

学生们于是不得不向各方寻求援助，并且首先求助于平日关怀与爱护她们的校内教师们。鲁迅和许寿裳，还有其他的几位教授，就在这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正义的斗争。

自“五七”以后，杨荫榆在校外更加大肆活动，她和当时北京的黑暗势力：反动的教育总长、北洋军阀的走狗“现代评论派”以及教育界的一些所谓“名流”，勾结了起来，加紧对于学生的迫害。学生自治会也发出了通告，吁请学校里的教师和社会上的人士，出来维护学校和学生的正当利益。

鲁迅和许寿裳等几个教员在5月27日的《京报》上发表了宣言，声明对于女师大事件的态度。在30日发行（其实29日已经出卖）的《现代评论》上，陈西滢等人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装出公正的嘴脸，无耻地散布着流言，故意隐约其词地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他所说的“某籍”“某系”就是暗指鲁迅等人，这些话也就是用来诬蔑鲁迅等人的。鲁迅的答复则是很坚决的，不管这班“正人君子”怎样散布无耻的流言，他说：“‘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的。”

正在女师大事件发展过程中，1925年5月30日，因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而引起的“五卅

“事件在上海爆发了；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残杀参加游行示威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于是在全国各地展开；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群众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了。使得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为惶恐。他们纷纷出来为反动势力辩护。鲁迅立即予以痛斥，并指出，枪杀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还有国内的封建统治阶级。他得出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必须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和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的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文化战场上，必须和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不是一条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的老路子。

自8月1日起，由“女师大”事件而引起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这日早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女子师范大学的正在开会商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三十多人。围困到下午四点钟，由于学生们不屈服，杨荫榆就下令停止一切供给，并雇用流氓驱逐学生，冲突更加尖锐起来，刘和珍等几个人被打伤。后来，杨荫榆下令割断电线，封锁校门，实施她的“坚壁清野主义”。

第二天，学生自治会发出紧急宣言，邀请北京50个学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北

大等33个学校的学生会联名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撤换杨荫榆。7日，以鲁迅和许寿裳为中心的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会宣告成立。女师大正式宣告和章士钊的教育部脱离关系，北京的学校和教育团体也发表了一致否认章士钊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的声明。在17日教育部会议上，章士钊宣布把女师大改组为“北京女子大学”，并且由他自己出面兼任筹备处长。会后三天，他委派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军警，雇女流氓，闯进学校殴打学生。除了打伤学生之外，还捕去14名学生。26日，段政府公布压迫学生的“整顿学风”命令。这时，陈西滢等人组织了一个“教育界维持公理会”，出来维持“公理”，——不久又改称“女子大学后援会”，作为章士钊后援女师大被非法解散了，原女师大学生们在宗帽胡同自租校舍，重新开学，聘请同情她们的教师，义务授课。鲁迅就是其中之一。

鲁迅是反动统治者眼中的“眼中钉”。章士钊以他参加女师大的校务维持会为借口，非法免除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位。鲁迅严厉地斥责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诬蔑、压迫青年的罪恶行为，并向“平政院”提起诉讼，控告章非法免职。

由于在广大的社会力量声援之下，学生终于获得了胜利。1925年11月30日，女子师范大学宣

告复校，章士钊逃往天津，杨荫榆被撤职，女子大学取消，学生们回原址上课，“女师大”事件至此就取得了完全胜利。

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新校长易培基到任，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表示欢迎，同时宣布校务维持会胜利结束。

林语堂在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提出了“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他认为“费厄泼赖”的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现在应该努力提倡，他又说，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坚决主张“打落水狗”的。他认为：对于“狗”，人们是不应该加以怜悯的，尤其是那一些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的叭儿狗，当中外娘儿们上街的时候，它们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人们后面跑更是可恶。它们虽然是狗，却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态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对于一些叭儿狗，鲁迅主张应该先行把它们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因为，如果对于叭儿狗宽容了，则别的狗也就可以不打。当他谈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时，认为：

“狗性总是不大会变的，假使一百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鲁迅坚决主张：必须打落水狗；必须和一切的恶势力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斗争；必须坚持韧的战斗。

“女师大”事件胜利结束了，“正人君子”们所制造出来的流言彻底破产了，他们又变换了另一个方式。陈西滢在1926年1月2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三卷五十六期的《闲话》里，宣布他们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同时又大谈其“做学问的工具”问题，规劝有志于做学问的人，不可不博览群书。其实，这是一个烟幕。

鲁迅把这一些比作小学生玩的“七色板”——用七种颜色涂在一块圆板上的玩具，——它不动的时候，倒也是很好看的，可是转不得，一转，它就变成灰色的了。这灰色，就正是“现代评论派”的保护色。这一班“正人君子”把群众领上妥协和屈辱的道路，也就是死亡的道路，安分守己地做着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军阀官僚的“顺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但这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在陈西滢声明“不管闲事”之后，他们不敢正面

地对鲁迅加以攻击了。他们于是就从侧面弯弯曲曲、鬼鬼祟祟地以私人通信的方式，散布流言，诬蔑鲁迅。鲁迅在杂文《不是信》里，给予驳斥，指出这些绅士们的“跳踉丑态”，是无法掩饰的。鲁迅说：正因为他的笔锋刺痛了社会上某一些神似“叭儿狗”的人物，因此，那些以“叭儿狗”自命的人，就出来表示十分悻悻不平了。绅士们说：鲁迅是爱放冷箭的。鲁迅说：不错，冷箭是放过几枝的，但所放的总是对准先“放冷箭”的陈西滢之流才放的，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冷箭”在以后也还是要放的，并无悔祸之心。

这个笨拙的战术被击破后，他们又改变了花样。由徐志摩等人出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他装出一副貌似公正的面孔，说：“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同时他还声明说：“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了。不用说，这仍是一骗局。

鲁迅说：不行！现在不能“带住”！须先揭露出来绅士服包起来的丑态和假面具的“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才能“带住”。鲁迅只要求他们，不再摆臭架子，忘却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绅士衣装抛到“臭茅厕”里去，除去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

句真话就够了。鲁迅的斗争艺术是十分高明的。他知道得最清楚，通过当前的现实问题，抓住了某种思想类型的代表人物，予以彻底的和坚决的打击；这不仅直接打击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全体，而且打了“叭儿狗”，在事实上，也就是打击了它的主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首先，把他们的“叭儿狗”打落水，在水里又从而打之，这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更加笨拙的缓兵之计又被击破了，他们于是再改变一个花样，那就是比流言更阴险和毒辣的诱杀手段了。1926年3月18日，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门前，屠杀徒手请愿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就是这一个罪恶阴谋的铁证。

在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开进了大沽口，开炮向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轰击。13日，日本政府就向段政府提出抗议；16日，英、美、德、意、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段政府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18日正午以前答复。18日，北京民众三万多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群众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各界代表走到段政府门前请愿时，段命令卫队开枪。霎时间，血肉横飞，当场40多人遇难，200余人受伤。枪声后，手拿大刀铁棍的散兵冲过来，他们向中枪扑地，

尚有生气的人，用铁棍大刀当头打去。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这时被虐杀。革命领袖李大钊头部也受了伤，但他仍镇定指挥群众撤离。

第二天，段卖国政府通缉“暴徒”的领袖李大钊等人；接着又通缉了鲁迅。于是，“不管闲事”的陈西滢又站出来了。他诬蔑学生们是“受人利用”而“自蹈死地”，以此种腔调来为他的主子竭力辩护，这也越发显露出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鲁迅针对陈西滢的“诬蔑”，写道：“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残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了一篇《纪念刘和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

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从“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深刻认识了三种人物：“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又从此得到了一种教训：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许褚赤膊上阵的战法不可再用，而应改用别种方式进行战斗。

惨案发生后，传说鲁迅被列在通缉的人之中，于是鲁迅出外避难。避难生活很不安定，加之写作的疲劳，使鲁迅回到自己的寓所后，胃病发作，经过短时间的修养，身体状况有了些改善。但不久后，北京的情形起了变化，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来到了北京，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不得不离开北京，由

津浦路乘车南下，再次来到了上海。

鲁迅到了上海后，就和许广平分手了；他们互相约定，两年之后再相见面。许广平由海路去了广州，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离开上海，前往厦门，应厦门大学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他所教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略》。他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两年，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同时把厦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是相信“有钱人说话”的校长——英国籍的中国人林文庆博士，是一个尊孔的买办，既不懂得鲁迅，也不懂得中国文学，他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皮，奴才的骨。这里的同事们也多是油滑浅薄、语言无畏、面目可憎的人物。下课之后，鲁迅住在图书馆的楼上，同事们无可与交谈者。现实的芜杂状态使他看了很难过，整天面对大海或翻开古书，四近毫无生人气息，自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便开始了生活的回忆。北京未名社正在此时向他催稿，他便写下了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后收入《朝花夕拾》。

在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着文科的预算，校长主张削减经费，最后，竟搬出他的买办式的格言来说：“现在是有钱人说话的时候。”鲁迅听了，摸出一枚两毛的银角子来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有钱，我也要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的一切言行，自不

能不与学校当局相左。鲁迅本“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12月31日，鲁迅向厦大当局提出辞职。因为他“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

在厦大，鲁迅还是战斗了5个月的，不过缺乏战友，战线也就布不成，但依然留给了厦大青年以革命的种子。厦大研究新文艺之风从此盛行，在他离校之际，还引起青年的觉悟，发生了改革学校运动，有不少进步青年，后来还和他一同去了广州。

这时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北伐”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鲁迅经常带着兴奋的心情给许广平写信报告胜利消息。鲁迅在厦大虽然感到有些孤军作战，但是他的战斗任务，客观上是与整个革命的要求合拍的，他的辞职，正是一种阵地的转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深入战斗的漩涡，纠集广大的群众来重新布阵，而早已住在广州的许广平，也表示愿作他“永久的同道”。同时，广州中山大学已把聘书寄来，这样鲁迅便离开了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来到广州。

鲁迅是抱着许多新希望到广州的。他想：“到中天后，也许不难选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此外，他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

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可是事实和他的希望相反，他觉得这“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在已成为革命的后方，还不免是灰色的，并没什么彻底的改革，旧势力仍然潜在着，他大失所望，他知道“不妙”了，他于是冷静了下来，他要看清楚这事实的真相。

在中山大学里，鲁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广州的青年对鲁迅景仰已久，现在他既然来了，自然希望他出来领导他们从事文艺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鲁迅回答他们说：“我的年纪比较老一点，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鲁迅这时候在青年中间，有一个新发现，那便是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他们之间已经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在鲁迅接近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可也有“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接着在官办的报纸上，有人用“流言”的“武器”，向鲁迅加以袭击、陷害。“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也一个一个地到广州来了。这种种事实，都在说明着反动势力的气焰日见嚣张。鲁迅在3月29日，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自己在广州东堤赁白云楼居住。

此后的局面愈演变愈恶劣，4月12日，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屠杀工人群众及共产党员，接着在广州也发生着同样的惨剧。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山大学“清党”，中山大学学生有许多被捕。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掉在中大的一切职务，从此专心写作，虽在炎热天气，手不停挥。4月26日，写散文集《野草》的“题辞”，热情地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是决不能消灭革命的。

从1927年的“四·一二”开始，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动的资产阶级退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去，国共合作的基础从此破坏了。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反革命势力却到处伸出罪恶的黑手，使空气中充满了残杀的气象。鲁迅在这时也变成招人疑忌的对象了，广州最阴险的报纸，竟蓄意陷害，说他已逃往汉口，但鲁迅却忍耐着住下去。可是像这样险恶的环境还能久住下去吗？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10月初，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在广州这一阶段的具体感受，大都记在《而已集》里。

鲁迅在“五四”至1927年这一个时期，曾经转移过几次阵地：从北京转到厦门，从厦门转到广州，

又从广州转到了上海。但这决不是妥协。即使在刀枪之下谈论读书问题，谈古典文学，那仍是具有革命性的。阵地的转移，是战略关系，是为了更好的战斗。我们晓得，鲁迅是反对赤膊上阵的，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他主张采用游击战，“壕堑战”，他要迂回曲折地战斗，以获得更大的杀伤效果，也就是他在“空谈”一文中说的：“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果然，在他到了上海之后的十年间，他的战绩更加辉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七、光辉的十年

1927年10月初，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

蒋介石卖国集团在上海举行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们依靠英美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以南京、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对于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他们要把中国变成为一片沙漠！

可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迅速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在这里，工人阶级曾领导过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1927年的著名的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历史上历次的革命运动。大革命暂时失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工人阶级带来了严重的迫害，他们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企图分裂和瓦解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仍进行着不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

鲁迅和许广平由广州回到上海，最初是在闸北景云里，先是在23号，后又搬到17号和18号，租了房子居住下来。恰巧，鲁迅和刚由武汉回到上海的

茅盾同住一条弄堂，而且是斜对门。于是鲁迅和周建人到茅盾寓所来看他，这是他们最初的会见。之后，鲁迅和从香港回上海的郭沫若准备合作，复刊《创造周报》，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实现。在这时鲁迅和创造社的郁达夫又进一步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鲁迅在上海定居后，和广大的青年，革命的和进步的团体，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928年2月，鲁迅又担任了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的《语丝》杂志的主编。同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又创办了以刊载文学创作和翻译为主的杂志《奔流》。

在鲁迅的直接帮助下，像柔石、王方仁，崔吾真等几个青年，在1929年组织了一个介绍苏联、东欧、北欧，以及西方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木刻版画等艺术作品的团体——朝花社。朝花社对于木刻的介绍，给中国的革命的新兴艺术，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途径。此后，新生的艺术团体在各地纷纷成立。在鲁迅的不断关怀和帮助下，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用自己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奠定了现代中国革命的艺术，特别是新兴的木刻的基础。

鲁迅从这时起，开始较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主持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所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以及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的著名文件，都曾编入这套丛书里。

上海的许多学校里的青年，听说鲁迅来到了上海，也纷纷来邀请他去讲演。有些学校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还准备请他教书。但鲁迅都谢绝了。他准备从此专门从事于创作和翻译工作。

从1928年初开始，也就是鲁迅刚到上海之后不久，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对于革命文学问题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在他们的刊物上，曾对鲁迅采取了错误的排斥和攻击的态度。认为鲁迅的作品是不革命的，鲁迅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言论，坚持高度的原则性，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在严肃的思想斗争中，鲁迅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当时的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的情况上来。

在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鲁迅自己也深入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批评是通过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进行的。他感谢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文艺论，纠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新月派”的梁实秋在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文学是有阶级的吗？》一文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来对抗。他企图抹杀文学

的阶级性，否认革命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他认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

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鲁迅给予应有的反击。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予以梁实秋以有力的驳斥，他认为，要抹杀文艺的阶级性是不行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在文化战线上，对买办资产阶级展开思想斗争，在当时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在共同的对付当前的敌人的目标之下，革命文学阵营的内部逐步走向了团结一致，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停止了对于鲁迅的攻击，同时由于鲁迅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革命文学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基础，同时，更由于当时的现实斗争的需要，所有的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统一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1930年3月2日，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提出了战斗要求，指示当前的战斗方向：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要注重实力。因为旧社会的基础在当时还是非常

坚固的，新的势力非有更强大的力量是不能动摇它的。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第二，战线应该不断扩大。第三，应该培养出大批新的战士来。革命文学阵营不但要急于造就大批的新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一切战士，还要必须坚持韧的战斗。

鲁迅的这些意见，十分宝贵和正确。

同时，鲁迅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大同盟”，这使他立刻就遭到严重的压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这最紧要关头，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得更加紧密。

当时，鲁迅和党中央负责人之一李立三取得了联系，并有过一次亲切的晤谈；他和年青的共产党员计划出版“左联”的机关杂志，组织年轻翻译家，介绍了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他率领一批年青战士，和黑暗的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倦的斗争。在尖锐的复杂的斗争中，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共产主义者。

1930年5月间，鲁迅由闸北景云里寓居迁移到离那里不远的北四川路底的一所公寓的房子里。九月间，上海的文艺界的同志们为庆祝他50寿辰，同时也为了庆祝革命文学运动新获得的胜利，9月17日下午，在当时“法租界”一家荷兰菜馆里，举行了

一个不大的庆祝会。鲁迅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这是一个秘密集会，大家陆续来到这家菜馆的小花园里。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爱子海婴，不断地向走进园子里的人致意。他的脸上露出柔和的笑容，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些人中间，不但有革命作家，还有革命的美术家、演员、新闻记者、教授、学生、红军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报纸编辑。会场内热烈的气氛和会场外的紧张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庆祝着鲁迅最可宝贵的50年的生活，祝他身体健康，更多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努力工作。鲁迅这天的谈话兴致很高，他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谈到了去日本留学，后弃医从文到最初的文学活动，谈到了世界的进步文学及自己的工作计划等等。庆祝会最终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1931年1月，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5个革命作家在上海被捕。2月7日夜，这5个人连同其他十几个革命者，在国民党政府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了！鲁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寓所，到附近的黄陆路花园庄暂避。反动派造谣，说他被捕了。这使得痛恨鲁迅的人十分快意，使得热爱鲁迅的人十分担心，不断来信，发电报询问。

鲁迅深深感到自己失掉了年青的战友，中国失掉了英勇的青年战士，在悲愤中，他提笔写下了沉痛的

诗句：——\$ \$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那时的中国，对于革命文学的压迫和封锁，真是比罐头还要严密。革命作家被暗中杀害了，而在当时的报纸上，却不准透露一点消息。“左联”为了纪念牺牲了的同志，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出版了一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杂文，对于国民党刽子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此外，鲁迅又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委托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译成英文，寄到美国

的进步刊物《新群众》上发表，向全世界广大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的血腥统治，和屠杀革命作家的暴行。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作家的愤怒，“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向全世界作家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全世界人民，起来共同抗议国民党对于中国左翼作家的迫害。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

1931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梦想用武力征服中国，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显得更加露骨了。国民党反动派甘心在国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走卒；对内加紧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红色政权区域进行多次“围剿”，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深入进来了。

为了掩饰国际帝国主义者们的狰狞面目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不抵抗主义的卑怯无耻，“民族主义文学家”，在这时也更活跃了。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

的任务和命运》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一定豢养一批流氓的。这一批流氓，在帝国主义者的眼中，则是最重的奴才，最有用的鹰犬，能够为主子尽着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任务。“民族主义文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帝国主义的宠犬。……”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又在上海响了起来，鲁迅的寓所，“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给许寿裳信）。遂搬到内山书店暂避，战事稍平息，即返回寓所。

1933年1月，鲁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所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举为执行委员，他这时已公开处于和国民党更加短兵相接的地位。5月13日，他亲至德国领事馆投递反抗“法西斯帝”暴行的抗议书。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杨铨（杏佛）被刺。这时候，国民党要杀害鲁迅的威胁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他已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但是他的态度却很镇静，且有牺牲决心，他决定不搬家，也不暂避，照常在家工作和出外走动。当杨杏佛入殓的那一天（按鲁迅日记载为6月20日），国民党又传布了威胁的风声，说就要在这一天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人，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但鲁迅毫不犹豫地到万国殡仪馆去送殓了，并且出门不带钥匙，表示决心牺牲。过了不几天，有一个日本人（鲁迅认为大约是侦探）向他

探问杨杏佛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则杨和共产党的关系又如何。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回答：“杨杏佛不但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忠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大可以放心！”是年，印出了《两地书》，并出版了《鲁迅自选集》。

在这几年里，鲁迅除了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领导左联外，还用杂文这种武器，集中火力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国联调查团，揭穿了国民党所谓“友邦人士”，原是与日本一伙的强盗（《二心集》：《友邦惊诧论》）。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它的汉奸走狗，其中包括：坚决屠杀中国人民、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向日本侵略者献“征心策”的胡适；叫中国人民不要反对日寇而去反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揭穿了国际帝国主义者诬蔑苏联，进攻苏联的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分清敌友，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击中，坚韧顽强地战斗着，呼啸着前进，而他那无产阶级的英雄性格也锻炼得更为坚强了。此外，他编印刊物，给青年校文稿，翻译介绍苏联文学，提倡大众语、大众艺术，这

些都是在封建迫害之下进行的。又加他日常接近的革命志士的失踪和死亡，这自然腐蚀着他的身心健康。鲁迅本患肺病，到1934年12月14日夜病发，感觉脊肉作痛，盗汗。他的朋友为了他的健康，老早就劝他设法易地疗养，但是他不愿离开多难的祖国。他说：“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裙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给李秉中信）高尔基曾邀请他去苏联住两年，作为私人宾客，他也不愿意去。1935年秋，苏大使馆邀请他去苏联观光，他的中外朋友都希望他去，鲁迅经过长久的考虑：“第一，他以为那时正在迫压最严重，许多敢说敢做的人，都先后消沉，消灭，或者不能公开做他们应做的工作，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第二，他自己检讨，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还不值得要友邦如此优待，万一回来之后仍是和未出国前一样的做不出什么，是很对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来呢，环境是否可能也很难说。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能力，就是给一般造谣者的机会，不是并不一动，就已经说他拿虚布吗？”（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结果仍是没有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以为中国需要他，他不能走，没有人应该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他曾对冯雪峰说：觉得那么躺着的日子，是会无聊得

使自己不像活着的。如真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此和他谈到工作计划时使他的精神振奋，谈到养病计划时就使他不快。果然，他晚年在战斗生活中特别放光辉的日子到来了。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主力经过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鲁迅和茅盾共同拍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一个庆祝胜利的电报：“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向东北开始进攻，即迅速占领东北全境，接着又进攻上海，进攻热河、察绥、滦东，中国土地一片一片地沦陷，长此下去，我国领土都将被日寇所吞噬，中国人民大部分要变成亡国奴。这就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同时也改变了中国革命文化战线的形势，抵抗日本侵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在日本进攻面前，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的，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领导与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原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蒋介石的回答是加紧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围攻。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北。在这期间，由

于日寇侵略的深入与蒋介石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共产党乃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1月28日又发布《抗日十大纲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八一宣言发表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在文艺界也先后提出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因而在组织上，也必须自动解散左联，建立新的文艺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以适应革命的新要求。对于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最初确实不大明白了，并曾怀疑过。他开始的态度是：“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我不是别的，就怕共产党又上当。”流露了他对于叛徒的深刻憎恶。但这种怀疑并未能造成政治上的错误，同时由于他明白了而且信任了毛主席对时局的英明观察和卓越的领导天才，以及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这暂时的怀疑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并且从言论与行动上热烈拥护起来。他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促成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在鲁迅一生最后的几年里，虽屡次与病魔作斗争，但自己也感到健康很成问题，可是决没有想到会死，一直坚持着工作。

1936年，9月5日，写杂文《死》，其中给亲属写下了十条遗嘱，特别叮嘱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是对于死的反抗和无视。鲁迅并未意识到自己会死的。17日，他还和家里人商量搬家的事，因大陆新村附近就是海军司令部，战争空气很紧张。当日夜间，他又病倒了。18日，呼吸困难，19日早5时25分，这一颗热烈的战斗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鲁迅终因肺病，不得不丢下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丢下他所未竟的工作而逝世了！

鲁迅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事业活着。人民是他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的继承者。

鲁迅一生对于人民的功绩，是无法计算的。以下是一个纳计：

创作小说3本，回忆散文1本，散文诗1本，共约35万字；

杂文16本，共约650多篇，1350000万字；

辑录、校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已出版共约800000万字；

翻译介绍俄国、法、德、日等国古典作家作品，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芬兰、荷兰、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的现代作家的作品，

共计长篇中篇小说和童话 9 本，短篇小说和童话 78 篇，戏剧 2 本，文艺理论著作 8 本，短篇论文 50 篇，共约

3100000 字。

他亲自接待了大约 500 个左右来访的青年；他亲手拆开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大约 1200 多个青年（包括相识和不相识的）寄给他的来信，他亲自写给他们的回信约 3500 多封；现只能收集到 1100 多封（《两地书》没有计算在内），共约 80 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写给青年人的。

这就是鲁迅给我们的文学遗产的概括的情况。

鲁迅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他为祖国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学习，而工作，而战斗的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着鲁迅的一生。因此才能使他“冗善若惊，疾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冲锋陷阵，勇往直前。才能使他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在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当中，锻炼出一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性格。

毛主席评价鲁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

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过去，曾鼓舞我们前进；现在，仍然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将来，亦是。

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将永远和我们同在，我们要从他那里汲取力量、经验和教训，建设我们的祖国。

鲁迅是我们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伟大先驱，他是经过了严酷的战斗的冬天之后，第一个到来的我们祖国文学的春天。

像鲁迅那样，爱祖国；

像鲁迅那样，爱人民；

像鲁迅那样，爱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结合起来。

像鲁迅那样，永远那么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像鲁迅那样，永远那么清醒，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鲁迅的这种品质和性格。

我们应继续发扬鲁迅精神，我们应向他学习，踏着他的足迹前进。